

战前马来亚华文教育探讨
A STUDY ON MALAYAN CHINESE EDUCATION
BEFORE 1941

廖穗芬
LIEW SUEY FEN

MASTER OF ARTS (CHINESE STUDIES)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JUNE 2015

战前马来亚华文教育探讨
A STUDY ON MALAYAN CHINESE EDUCATION BEFORE 1941

By

廖穗芬
LIEW SUEY FEN

本论文乃获取文学硕士学位（中文系）的部分条件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Chinese Studies)
June 2015

摘要

战前马来亚华文教育探讨

廖穗芬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之所以能有如今的成就，都是由从马来亚时期的华人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提升自身的经济能力，再集结来自各社会阶层华人的资金和力量，自办华文教育演变而成的。假如说最近五、六十年以来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是在受国情与政策影响之下所发展并形成本土化教育，那么早期华文教育的发展都是深受中国政治局势的影响，逐渐由私塾、学院发展为新式学校。有鉴于此，本论文旨在探讨 1941 年之前的华文教育。

全文共分为六个章节：

第一章绪论论述了研究动机、研究范围、研究成果回顾及研究方法。

第二章概述马来亚（即马来半岛及新加坡）整体的历史及政治发展、华人移民及华人人口的发展和华人在马来亚经济地位上的演变。

第三章论述从 19 世纪以前至 1941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前在幼儿园、华文小学、中学的华文教育以及华文学校的经济、师资、课程等发展及演变状况。早期的华文学校仅有华文小学，之后才逐渐发展为华文中学。1920 年以前，英殖民政府对华文教育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1920 年颁布《1920 年学校注册法令》，列明华文学校所有的课程、卫生等，都须符合英殖民政府的要求。此法令实施后，莫不对华文教育往后的发展产生了颇深的影响。

西方女权运动的兴起，首先影响了中国进而影响马来亚，续而兴起了女子华文教育的发展，本文第四章分析当时女子华文教育的发展。华社除重视知识的传授外，文化的传承可说是华社关注的另一点。故本章除了分析女子华文教育的发展以外，还会以学校的课程活动探讨早期华文教育是否含有文化的传承以及华校在传承文化时所扮演的角色。

第五章分析马来亚人口及经济，政治如何影响华文教育的发展。

第六章研究成果希望可以厘清华文教育和女子华文教育的起源和发展。并透过马来亚历史了解局势、经济和政策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所造成的影响及演变。

关键字：马来亚，华文教育，女子教育，文化，政治，经济

ABSTRACT

A STUDY ON MALAYAN CHINESE EDUCATION BEFORE 1941

Liew Suey Fen

Malaysian Chinese education has its achievements today because since the 'Malaya' era, the Chinese basing on their hard work have increased their economic power, and further combined resources and manpower from one another, to build up local Chinese education. If we say that for the past fifty to sixty years,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sia has been influenced by local cultures and policies and has since become a form of local education, then earlier developments of Chinese education had been deeply affected by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China, changing from private and public schools to modern schools. Based on this, the theme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on the Chinese education before the year 1941.

The whole dissertation consists of six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is the introduction. It narrates the research motives, scope, review of results and research methods.

The second chapter summarizes Malaya's (The Malay Peninsula and Singapore) overall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s, the immigration of Chinese people, the growth of local Chinese population and the changes in role

of the Chinese on Malaya's economy.

The third chapter discusses Chinese education in kindergartens, primary schools and secondary schools plus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economy, teaching manpower, curriculum and other aspects of Chinese schools from the nineteenth century until the year 1941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started. Early Chinese schools only have a primary school section, after which a secondary school section would be set up. Before the year 1920,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took a "laissez-faire" policy towards Chinese education.

In the year 1920, The Registration of Schools Ordinance of 1920 was issued, stating that all curriculums, sanitation and other aspects of Chinese schools are required to comply with requirements of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Implementation of this Act created a great impact on the later developments of Chinese education.

The rise of feminism in the West first affected China and went on to affect Malaya. This brought the rise of Chinese education for female, therefore the fourth chapter of this dissertation analyses Chinese education for female at the time. Other than emphasising on the teaching of knowledge, the Chinese also see importance in the continuity of culture. This is the reason this chapter also probe whether early Chinese education consisted of the passing on of culture and the role of Chinese schools in the passing on of culture based on the curriculum of that time.

The fifth chapter analyses the population of Malaya and its economy plus how politics affect the growth of Chinese education.

The sixth chapter is about the research results. The research hopes to clear any mist on topics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s of Chinese education and Chinese education for girls. And also hope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and changes on Malaysian Chinese education of the times, economy and policies through Malayan history.

Keyword: Malaya, Chinese Education, Female Education, Culture, Politics,
Economy

谢词

几经波折后，硕士论文终于完成了。因此，借此机会，想要答谢在这段时间内，曾经伸出援手帮助我的所有人，让我能顺利完成论文。

首先，要答谢的是我的论文导师——林水椽老师在这几年内所给予的指导。在老师身边学习的日子，让我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此经验亦在撰写论文时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在此，再次感激老师对于愚钝的我的包容以及耐心。

其次，是要答谢在这段时间内给予我精神上以及行动上绝对支持的家人。在面对难题时，他们总是站在不同的角度，给予我意见、方法以及适当的精神支持与包容。没有他们的支持，相信本论文也很难能完成。另外，也要答谢在新加坡寻找资料这段时间内，悉心照顾我的姑姑、表哥姐妹们。

接着，是要答谢曾经协助我以及提供意见予我的陈中和老师、何启良老师、张晓威老师、郑文泉老师等。还有要感谢在寻找资料时提供协助的新加坡国立中文图书馆的职员与在校生，以及我的一班朋友如兴中、涌和、凌香、佩玲、秋霞、子翔、美燕、心慈、小惠、明峰等。谢谢新纪元中文图书馆、南院图书馆以及拉曼大学图书馆的资源协助。

论文核实书

本论文战前马来亚华文教育探讨为廖穗芬亲自撰写，是为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硕士学位取得之学位论文要件。

此证

(林水椽兼任教授) 指导老师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兼任教授

日期：_____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日期：23.06.2015

硕士论文提交

此证廖穗芬（学号：09 ULM 08865）在中华研究院中文系林水椽兼任教授指导之下，经已完成此一题为战前马来亚华文教育探讨的硕士学位论文。

本人亦了解拉曼大学将以 pdf 格式上载本硕士学位论文至拉曼大学资料库，供作拉曼大学教职员生及社会人士查阅使用。

此致

（廖穗芬）

论文声明

本人谨此声明：除已注明出处之引文外，本论文其余一切部分均为本人原创之作，且未曾在此前或同一时间提交拉曼大学或其他院校作为其他学位论文之用。

姓 名：廖穗芬

日 期：23.06.2015

目录

	页数
摘要	ii
ABSTRACT	iv
谢词	vii
论文核实书	viii
论文提交书	ix
论文声明	x
表目录	xiii
章节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	5
第二节 研究范围	6
第三节 研究成果回顾	7
第四节 史料介绍	11
第五节 研究方法	12
第二章 战前马来亚发展史	14
第一节 马来亚史迹简述	14
第二节 华人移民	17
第三节 马来亚华人经济	23
第三章 战前马来亚华文教育发展	31
第一节 学前教育	33
第二节 1920 以前的华校发展	34
第三节 1920 以后的华校发展	37
第四节 华校的经济来源	39
第五节 华校的课本	41
第六节 师资的来源	43
第四章 华人女子教育的发展及战前华校所传习的文化	45
第一节 华人女子教育	48
第二节 战前华校所传习的文化	53

第五章	华教与华人移民和华人人口、经济及政治之关系	61
第一节	华人移民与华人人口	62
第二节	华人经济与华教发展	64
第三节	政治与华校发展	66
第六章	结论	71
征引资料		75
附录		88

表目录

表	页数
表 2.1: 马来亚华人男女比率 (每 1, 000 名男性)	22
表 2.2: 华人与欧人在马来亚锡矿业的百分比	24
表 2.3: 马来亚橡胶生产量	26
表 3.1: 马来亚华人识字率 (1921、1931 年) (每一千人)	32
表 4.1: 海峡殖民地和马来联邦华文学校学生 (1931——1937 年)	51
表 5.1: 马来亚华人移民人口成长百分比 (1913-1926)	63
表 7.1: 日本横滨大同学校《小学新读本》卷一至卷三目录	88

第一章

绪论

纵观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历史，在这多元种族的国家里，华文教育可说是曾走过一条铺满了荆棘的道路。尤其是在马来西亚独立以后，华文教育就遭遇到波折以及阻碍。尽管华人社会力图保持华文教育的原貌，但是今天的华文教育，已经本土化、马来西亚化，成为传达本土意识、国家立项的一种教育，和其他民族的教育所负的责任相同，成为马来西亚国家教育的一环。（郑良树，1998：14）

若撇开华文教育的本质不谈，华文教育至今还能屹立不倒，这都是仰赖于华社先贤不断地支持及维护华文教育的地位。若非先贤们对华文教育的坚持与维护，想必今天在马来西亚已觅不得华文教育的踪迹了。

维护母语母文教育的基础是建立在一个民族或种族的文化和语言密不可分之关系上。（林开忠，1992，103）母语教育就短期和长期成绩看，比较非母语教育显然更好。（严元章，2002：81）新加坡目前的总理李显龙认为：

语言、文化和价值观是息息相关、脉脉相传的，假如我们用另外一种语言，比如说英文，来表达华族文化和价值观，在翻译的过程中，可能只是翻译了原文的 70%或 80%，一些原有的色彩和意义就无法全面地解释与表达。（转引自张亚群，1996：8）

为了要达到教育最高的效率，教育的系统应完整与健全。受教育，由最低到最高，都不应有肤色、信仰、贫富的不同，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因为不健全与不完整的制度，将会造成多种的不满与不平而引起分裂。在这种情形之下，社会将不安，国家人民也很难进步。（王品棠，1985：20）

在现代，文化的传承一直是华社所重视的事情，而家是华人子弟最容易受到文化熏陶的第一个场所。文化即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父母的生活作息及待人处事都非常重要，皆因父母是孩子们的借镜。由于很多祖辈虽知其文化的型，却不了解文化的质，导致现在很多孩子都无法理解文化的内涵而对之失去了兴趣。所以为了让华人子弟学习民族的文化，很多华人会馆和华人社团都肩负起这一重担。尤其是在 80 至 90 年代之间，华人社会弥漫着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如寻根系列展览会（包括各种传统的家具等）、传统水墨画、书法、春联、灯笼（灯谜）、杂技、地方戏剧、民歌、儿歌、华乐、棋艺、民族舞蹈、武术、体育和华人节日等（包括农历新年、端午、清明、中秋、中元节）。这些传统是推动者有意将它作为表述民族文化，以形成某种刻板印象，也是在国家文化政策形成后的一种反应。基本上它是接受国家文化政策对文化的定义与但不赞同其执行方式。因此国家文化政策里有关文化的定义是透过华人社团的反应而得以明显看出，而华人文化运动的形成也可以说是国家干预下的产物。（林开忠，1992：119-120）另外，近年来在新加坡、

马六甲、檳城、吉兰丹州等地皆掀起了一股保护和弘扬土生华人文化¹的热潮。（曹云华，2001：371）当然，华人会馆和社团也是在近几十年内才开始扮演推广民族文化的角色，早期并不是主要宣扬民族文化的场所。

除了上述的场所以外，小孩子身处最长时间的场所，当属学校了。现在学校所传习的文化与各华人会馆、华人社团里所传习的文化是不相同的。如上文所述，在各华人会馆、华人社团等场所所学到的是民族文化，在现代学校里虽然同样也能学习到民族文化，但更多的却是偏向本土化的国家文化，如马来西亚的国情、各种族的文化及节日等。

在传播教育和文化的立场上，除了华校这个机关，广播和报业也扮演着这个角色。马来西亚广播业，可以远溯至上世纪30年代。当时国内一些业余人士组成的无线电协会广播组织，即其滥觞。（林水椽，1998b：9）马六甲是世界华文报刊的发祥地。马来亚华文报刊²在推广华文文化、启迪民智、沟通信息等各方面做出了许多贡献。（严正，2004：6）中国早期的政治以办报兴学的方式，激发华人对中国政治认同和爱国精神；在私人界，出现两批人群：一为以商业利益投入办报的华

¹ 土生华人文化主要是一种民俗文化，它缺少自己的完整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它主要是以物质文化（包括手工艺术、建筑、家具、服饰、烹饪）和民间宗教与风俗习惯等形式表现和保存下来。（曹云华，2001：371）

² 1815年首份华文报《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出自英人传教士，在于传播宗教福音。接下来的《叻报》、《星报》，都在教育群众方面作其贡献。20世纪初叶，《天南新报》、《旧新报》、《国南日报》或《南洋总汇新报》，几乎都是与拥护或反抗中国政治理想有关。（潘友来，1985：175）

商，另一为抱着启迪民智使命，从中国南来的教育份子。（曾丽萍, 2000: 18）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党派纷纷创办报刊，如新加坡的《图南日报》、《中兴日报》，檳榔嶼的《光华日报》等，都是宣传民主革命的报刊。（洪丝丝：1984，218）；以《叻报》为例，其报章是由私人界所创办的，该报章早期主要是报道中马地区的新闻。尔后，随着时代的变迁，《叻报》的内容也逐渐丰富化，开始对人们进行思想教育，如有关宣导道德的〈忠告青年男女〉（《叻报》，1922.11.8: 15）、有关家庭伦理类的〈家庭须知〉（1922.11.9: 13）、有关卫生的〈秘结之预防〉（1922.11.8: 15）、有关常识的〈乘足踏车者宜注意〉（1922.11.9: 13）、〈各国婚礼奇闻〉（1920.9.24: 9）等等内容。

笔者以陈育崧将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史分为四个时期为基础，整理后所得的分期为：（一）启蒙期的私塾教育：从 1819 年檳榔嶼五福书院的开办，到 1900 年康有为的南来止；（二）勃兴期的兴学运动：从 1900 年起，到 1920 年学校注册例的颁布止。（三）动荡期的危机和成就：从 1920 年起，到 1957 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止。（四）转形期的“马来亚化”运动：从马来亚独立开始。（陈育崧，1984b: 222）

笔者认为要研究华文教育，首先应当要追溯回早期刚萌芽的华文教育史。因为这段时期的华文教育就宛如初诞生的婴儿，时间的流逝、历史事件的磨练，使得它逐渐成长、转型、成熟。在它的成长旅程当中，也体现了华社对华文教育的执著与坚持。本论文研究是针对启蒙期至动荡期之间的华文教育，故本论文题名为《战前马来亚华文教育探

讨》。

由于本研究的对象是华校，所以广播和报业教化华人、华人会馆和华人社团宣扬民族文化的內容只在此表过，内文将不再提及。

第一节 研究动机

笔者之所以对马来亚华文教育产生兴趣，主要是受祖父母的影响，皆因笔者自幼就常听两位出生于20年代的祖父母讲述他们年幼的故事。

祖父曾受教育到二年级，由于家道中落，而被迫中途辍学。少年时代即从中国南下至马来亚工作挣钱并汇钱回中国的家乡。因为幼时无法继续念书的遗憾，经商后，不仅时常在马来亚当地出钱支持华校及其他源流学校的建设，还会汇钱回中国的家乡赞助晚辈的教育费；祖母是马来亚土生的华人，曾在槟城求学，曾祖母觉得女子无须念那么多书，所以祖母仅受教育至小学三年级而已。观念保守的土生曾祖母，也曾想为祖母缠小脚，幸得开明的曾祖父劝阻，认为时代不同了，亦无需让后辈承受不必要的痛苦。

祖父母无法念书的遗憾及对教育的支持，是笔者对华教产生兴趣的主因；发生在祖母身上的经历，也让笔者了解马来亚早期的华人移民即使是到了马来亚，也保留了中国早期的文化及观念，致使笔者对早期

华社对女子教育的看法以及文化激起了好奇心。

接着，笔者阅读有关马来亚教育史的时候，发现大多数的研究者主要以华文小学和华文中学为研究对象。在了解马来亚的华文教育史后，笔者认为在谈马来亚华教历史时，也应该将学前教育纳入其中。笔者认为研究华文教育不应忽略了儿童的学前教育（指幼儿园），毕竟幼时的教育将成为往后进入小学、甚至是中学的奠基石。

因此笔者将结合幼儿园、中小学、女子教育的发展和演变，同时研究当时华校所传习的文化、华教与华人移民和华人人口、经济以及政治之间的关系以撰写本论文，盼能为华教历史献上一点绵力。

第二节 研究范围

本论文的研究时间年限是始于 19 世纪初期到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前，也就是 19 世纪初期至 1941 年间。本研究所针对的对象是 19 世纪初期至 1941 年之间的所有华文教育，当中包括了幼儿园、小学和中学的教育。

至于研究的区域范围将锁定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这是因为早期的马来亚和新加坡是不分家的，而当时马来西亚还未成立，所以本论文的研究区域并不包括沙巴和砂拉越在内。

其他的研究对象也包括马来亚的华校文化以及女子教育、英属马来亚的执政者、中国政治家、马来亚经济与华人移民和华人人口。

第三节 研究成果回顾

在资料收集时，笔者致力于本校图书馆馆藏、新纪元学院馆藏、南方学院馆藏、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中国期刊网等。研究马来亚华文教育的前人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

- 1) 郑良树所著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³共有四个分册，所研究的是早期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演变到现今的华文教育。此著作的第一和第二分册主要是研究战前马来亚华文教育的发展，从华教的起源乃至近代华教的演变，作者都非常详细地分析之。郑氏在这本著作中研究的范围也非常的广泛，从早期的私塾、小学、中学、师范、女子学校等都有涉及到。
- 2) 林远辉所著的〈马来亚独立前的华侨学校〉⁴，此篇论文是略去马来亚华校的创办和对中国的关系与贡献，直接探讨马来亚独立前的华校。透过这篇论文，笔者可以了解到早期华校的演变特征以

³ 郑良树（1998）。《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份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郑良树（1999a）。《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二份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郑良树（2000）。《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三份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郑良树（2001）。《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四份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

⁴ 林远辉（1981）。〈马来亚独立前的华侨学校〉，载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编：《华侨史论文集》，第二集。（页 241-265）。广州：广州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

及华校和英殖民政府之间的关系。

- 3) 陈绿漪所著的〈大马半岛华文教育的发展〉⁵，是探讨 1900 年至80年代的华文教育。作者以为令马来西亚华校骤变的推动力早期是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变革，然后就是华人社会对子女教育的关注。此外，论文中除了探讨影响华校发展的报告书和教育法令之外，还有华社为坚持华教所进行的华教运动。
- 4) 莫顺生所著的《马来西亚教育史 1400-1999》⁶，不仅只是探讨华裔的教育史，而且还包括了巫裔及印裔的教育史。这本著作令笔者了解了整个马来西亚各族之间的教育发展。
- 5) 陈国华所著的《先驱者的脚印——海外华人教育三百年》⁷是以年代为序，采用新闻报导形式将 1690-1990 年之间涉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国海外华人在各地进行的华文教育事件进行扼要叙述。除了事件以外，还有介绍将近 100 位曾为华教献出一份力的人物。

⁵ 陈绿漪（1984）。〈大马半岛华文教育的发展〉载林水椽、骆静山编：《马来西亚华人史》。（页 283-325）八打灵：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

⁶ 莫顺生（2000）。《马来西亚教育史 1400-1999》。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

⁷ 陈国华（1992）。《先驱者的脚印——海外华人教育三百年》。Toronto：Royal Kingsway Inc.。

- 6) 许甦吾：《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⁸，主要是以新加坡为对象，但是著作中也有提到马来亚。这本著作所涉及的内容除了私塾教育、学校教育以外，还有特种教育、社会教育、教育经费与教师待遇、教育团体等等，几乎是面面俱到。作者还将一部分的华校创办史编入书中，这有助于笔者了解早期华校的创办史。
- 7) 林水椽所著的〈独立前华文教育〉⁹，是一篇探讨马来西亚独立前的华文教育的文章。其特点是运用了学校间数、学生人数以及教员人数，探讨独立前的华文教育演变，而且还善于融合图表和历史为分析点，如藉图表和历史背景分析华校师生增减的成因。
- 8) 方起驹、杨耀宗、金永礼所著的〈新马¹⁰华人教育发展小史〉¹¹，以简洁扼要的方式介绍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化教育发展史。这篇论文对于开始接触马来亚华文教育发展的读者，能让他们很快掌握华文教育发展史脉络。

⁸ 许甦吾（1949）。《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新加坡：新加坡南洋书局。

⁹ 林水椽（1998a）。〈独立前华文教育〉，载林水椽、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二册）。（页 215-254）。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

¹⁰ 新马为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简称，以后研究中均使用“新马”这一简称。

¹¹ 方起驹、杨耀宗、金永礼（1984）。〈新马华人教育发展小史〉，载吴泽编：《华侨史研究论集（一）》。（页 330-337）。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9) 林水椽所著的〈马来西亚成立前华文教育的发展与教育政策的冲突〉¹²，是一篇探讨马来亚独立前的教育政策对华文教育的冲突的论文。这篇论文对于笔者了解英殖民政府颁布的教育政策和其对华文教育的影响，提供了不少的帮助。

以英文书写并研究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论著还有Lee, T. H. (2011) 的*Chinese Schools in Peninsular Malaysia: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以及 Lim,C.K. (2008) 的“*At the Nation’s Service: Development and Contributions of Chinese Education*”。前者是研究马来半岛的华文学校，后者则是研究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以及贡献。

除了上述所例的书以外，大范围的研究当时的马来亚，包括其华人社会、华人经济领域、华文教育等的，有华侨志编纂委员会（1959）的《马来亚华侨志》、黄尧（2003）的《马星华人志》、宋哲美（1964）的《马来西亚华人史》、许甦吾（1949）的《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Vaughan, J. D. (1879)的*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等等。但是这些著作只是陈述当时的政治、华人社会、华人经济、华文教育发展，并没有阐述这几方面之间互相影响的关系。

¹² 林水椽（1999）。〈马来西亚成立前华文教育的发展与教育政策的冲突〉，载林水椽、博孙中编：《东南亚文化冲突与整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 107-126）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与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联合出版。

研究女性以及教育的有黄贤强和范若兰，这两者中首推范若兰的研究。范若兰（2005a）的《移民、性别与华人社会：马来亚华人妇女研究（1929-1941）》是主要从各方面如移民因素、妇女职业、经济、教育等研究早期的马来亚华人妇女，并阐述女子教育与职业和经济之间的影响。黄贤强（2004）的〈槟城华人妇女问题——以《槟城新报》之女子教育论述为中心〉，是以《槟城新报》的内容研究当时的女子教育以及华人妇女间的问题。

综合上述的前人研究，笔者发现在马来亚华文教育史中，大部分的前人都以小学和中学为研究对象，而以幼儿园为研究或探讨对象的研究者极少。由此，笔者除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战前马来亚的华文教育，还加入幼儿园为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之一，并且研究华教与华人移民和华人人口、经济以及政治之间的关系。

第四节 史料介绍

本研究主要参考的史料，是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的文档，即马来亚早期的华文报刊，如《叻报》、《新国民日报》以及《槟城新报》。

《叻报》、《新国民日报》以及《槟城新报》是马来亚早期的华文报刊，也是最原始地记载并让后人了解马来亚当时生活实况、社会动态、教育发展的途径。

除了报章以外，笔者也为了解早期影响华人种植业的法令，那就是来自吉兰丹州政府官网所载的 1930 年土地保留法令以及 1938 年的吉兰丹土地保留法令。

第五节 研究方法

除了史料以外，笔者较多采用的资料还有次级研究资料，本论文的次级研究资料来源如下：

1. 学术著作和期刊
2. 专书
3. 自传
4. 报纸新闻
5. 论文
6. 杂志
7. 电子书籍

笔者将采用考证、综合、归纳以及分析的方法，以研究本论文。笔者也将细读有关马来亚华文教育史的相关书籍，马来亚早期报刊，以了解马来亚华文教育的背景。笔者将以《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椰阴馆文存》、《移民、性别与华人社会：马来亚华人妇女研究（1929-1941）》、《槟城钟灵中学史稿（1917-1957）》、〈马来亚独立前的华侨学校〉及〈独立前华文教育〉为主要的参考资料。

本研究欲解答以下的问题：

- (一) 华教自学前教育、小学、中学的历史演变
- (二) 早期华文教育所传习的文化，以及华校领导者所扮演的角色
- (三) 华教与华人移民和华人人口、经济以及政治之间的关系，这三方面如何影响早期华文教育的发展

第二章

战前马来亚发展史

早期的马来亚只有当地的土著，随着时代的变迁，科技技术的发达，许多人种经由不同的方式和目的来到了马来亚这一片土地，华人即是当中的其中之一民族。

第一节 马来亚史迹简述

马来半岛，乃亚洲大陆通往东南亚群岛之一道桥梁，自古即为移民之孔道。根据许多考古学家之研究，在5千年前，马来亚半岛已有人类居住。从过去发现先民之遗物中，足可相信在史前时代之印尼人、美拉尼西亚人及澳洲人，均曾利用马来半岛而往南发展。（华侨志编纂委员会，1959：31）马来半岛的形成是始于距今7千万年的中生代后半期，中国发生“燕山运动”，造山压向东南强烈地推进，造成一条褶曲山脉，自缅甸东北部的弹邦（Shan States）高原，经过目前的马来半岛，掠过新及（Sinkep）、邦加（Banka）和勿里洞（Biliton）诸岛，和苏门答腊东海岸、折往婆罗洲，形成一大片陆地，目前的马来半岛就包在这陆地内。距今1千5百万年的新生代第三纪，“阿尔卑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新褶曲山脉从缅甸的阿罗干（Alakan）南下，经过现今的安达曼（Adaman Islands）和尼可巴群岛（Nicobar Island），到苏岛和爪哇的南部，和“燕山运动”所造成的地块相合，形成面积比印度更大的孙陀洲

(Sundaland)。到第四纪洪积世第四冰期末，北方大陆上的冰盖融解，海水骤涨，孙陀洲的低地全被淹没，再经长期的侵蚀和堆积，逐渐互相连接起来，成为狭长的半岛。（许云樵，1978：57）新加坡位于马来亚以南，其地名是莱佛士在1819年开辟时所定名的，据陈育崧分析，除此之外的地名还有多摩长、莫诃信洲、浦罗中、淡马锡、龙牙门、长腰屿、石叻等。（陈育崧，1984a：47-64）

在英国殖民者到来之前数个世纪，马来半岛一直处于分散割据的局面，只在马六甲王朝时期出现过短暂的统一局面。1405年，拜里米苏刺建立马六甲王国（又称满刺加王国），1445年和1456年它两次打败了暹罗军队的入侵，接着进行统一马来半岛的战争，彭亨、柔佛、丁加奴、霹雳等地先后被征服，从而结束了马来半岛长期分散割据的局面。15世纪末马六甲王国势力逐渐衰落，终于在1511年被葡萄牙所灭亡。葡萄牙在占领马六甲后，实行排斥他人的垄断政策，并尽力迫使所有路过的船都来马六甲，而且对当地商人进行剥削和掠夺，弄得民不聊生；殖民官吏贪污腐败，管理不善，这一切都导致马六甲的贸易经济逐步的衰败以至于崩溃。（刘为胜，2009：9）

葡萄牙在马六甲实行的贸易垄断政策，引起了其他国家的不满，尤其是想从东方香料贸易中获取巨额利润的荷兰。荷兰人为了继续获取巨额的贸易利润，便展开了对马六甲城的围攻，最终于1641年攻占了马六甲，将葡萄牙人赶出了马六甲。荷兰将马六甲据为己有之后，将其置

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控制之下。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马来半岛同样实行贸易垄断政策，通过香料贸易获取暴利。荷兰人在垄断当地贸易的同时，并对马来半岛的进出货物实行许可证制度，收取高额关税。（刘为胜，2009：10）

马来亚的英殖民统治始于 1786 年槟榔屿之占领，之后英势力在马来亚逐渐扩展。1800 年，威省被并入槟榔屿；1824 年，在苏门答腊的英属地民古伦（Bengkulen）与荷属马六甲交换。1826 年槟城、马六甲、新加坡（1819 年英占领）和霹雳的天定（1935 年又隶回霹雳州）合租成海峡殖民地。1846 年，沙巴的纳闽（Labuan）被并入海峡殖民地；1890 年纳闽隶属当时的北婆罗洲。在半岛上，英势力开始于 1874 年控制霹雳州；1895 年，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彭亨联合组成马来联邦。吉兰丹、丁加奴、吉打及玻璃市则于 1909 年受英国保护；1914 年柔佛也受英国保护；这五州合称马来属邦。上述三种政体，即海峡殖民地（马六甲、槟城、新加坡）、马来联邦（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彭亨）以及马来属邦（吉兰丹、丁加奴、吉打及玻璃市、柔佛）一直并行至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钟临杰，1998：201）

二战以前，英国在马来亚一直实行传统的“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英国一方面将马来人招募进殖民政府、军队和警察等部门，却将华人、印度人排除在这些部门之外，他们的公民身份也长期得不到承认；另一方面，英国在与世界市场联系紧密的现代经济部门大量雇佣华人、

印度人，使这两个民族在经济实力上要比主要从事农业的马来人强大得多。英国实行的“分而治之”政策，使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之间缺乏共同的利益，也不利于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因此到二战以前，马来亚实际上是由三个民族社区组成的“社区式社会”。这种分裂的社会结构显然不利于超越各民族社区之上的马来亚民族主义的形成，所以二战以前马来亚只有马来人、华人或印度人的民族主义，没有形成统一的马来亚民族主义，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马来亚的非殖民化时期¹³。（王成，2003：86）

第二节 华人移民

古代中国的远洋帆船，在增进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关系，商品交换和文化交流，曾作出颇大的贡献。（李业霖，1972：3）早在宋朝，中国造船技术和指南针开始了华人海上航行的历史，福建泉州历史上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明朝郑和下西洋更把海上交通推向了高潮。（严正，2004：2）在18世纪初叶至19世纪的40、50年代，欧洲资本主义处于上升的阶段，在对外贸易方面，葡萄牙和西班牙已趋衰微，但是英国却以锐进的姿态猛然向前发展，而且与荷兰展开激烈的竞争。18世纪50年代，中国帆船除在中国本土制造以外，中国船商又在暹罗投资造船，使

¹³ 根据李安山的研究，“非殖民化”这一概念是由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Бухарин）在1927年提出，而对其进行理论概括的是印度共运创始人马纳本德拉·纳特·罗易（Roy, Manabendra Nath）。在学术界对这一概念，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非殖民化”是指殖民宗主国在二战后（甚至更早）主动给予殖民地独立或自治地位的行为，或是殖民宗主国有计划运作的结果；第二，“非殖民化”主要是指殖民宗主国在撤出殖民地过程中采取旨在维护自身利益的行动，使用时应该谨慎；第三，“非殖民化”一词含义丰富且具中性，它所表达的是一种顺应历史潮流的过程或一种运动。（李安山，1998：2、6）

暹罗成为当时中国海外造船业的中心。在 19 世纪初叶，中国帆船在马来半岛东西海岸进行贸易的帆船，至少有3艘，计3千多吨位。（李业霖，1972：3）造船业的发达，不仅仅是缩短了一个地域和另一个地域之间的往返时间、促进了各国间的贸易活动，更是人类进行移民活动的交通工具。

近代中国朝廷（中央政权）对于华人移民海外的政策，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1）1860年前为禁止移民时期；（2）1860-1893年：因英法联军（1857-60）进侵中国，中国被迫允许外人雇用华工前往外洋工作，是为清朝朝廷开放移民外洋、弛禁移民之始。华人此后至海外移民，无论是集体性的“契约劳工”移民或个别性的华人自由移民，均已弛禁。（李恩涵，2003：147）但是清朝朝廷仍然不准在外华人回国（李盈慧，1997：22），在国内法律上他们均仍是禁往外洋如故，一直到1893年才经由光绪皇帝的煌煌上谕，废除了传统多年来移民回国的禁令；（3）1893-1912年至当代：移民海外的华人受到清朝朝廷与此后历届政府的重视，对于他们在海外所遇到的困难与种种问题，中国均予高度关心，主动设法协助予以解决。中国历任政府也高度重视海外移民与祖国的关系，并欢迎他们回祖国投资或加强两国间其他形式的经济性、文化性与政治性的关系。（李恩涵，2003：147）

（一） 马来亚华人移民

据《马来亚华侨志》一书研究指出中国移植马来亚最早的记录是一位于943年由中国经三佛齐（Srivijaya）返国的阿拉伯商人马索底（Abul Hason Ali Elmasudi）在其所著 *Lea Prairaiesdor* 一书中载称：“众多中国人耕种于此岛（指苏门答腊），而尤以三佛齐区域（包括马来亚在内）为多，盖避其国中黄巢之乱而来者”（华侨志编纂委员会，1959：58）

马来亚早期的华人移民者多数来自中国南部如广州、汕头、海南岛、及福建等地，而且都是来自中国下层社会人士，中上层社会人士及妇女都不在最早期的移民当中。（Vaughan, J. D., 1879: 7, 8）这些早期华人移民至马来亚可以分为两种模式：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和契约制的移民。当早期华人移民的生意已有了基础，他们便开始招募亲戚来协助操业。另一种契约移民，是那些贫困和没有亲戚支助的华人移民，大部分接受劳工中间商、船长或劳工代理人所提供的预支船费。抵达目的地后，契约移民将配置到矿区和园丘当劳工。（颜清湟，1984：4）

华人大量移入马来亚始于 1786 年英人占领槟榔屿之时。随后，英殖民地势力逐渐由槟岛扩展至马来亚其他各州，各地华人人口也跟着激增，根据估计，至少有5百万华人曾经在 19 世纪进入马来亚（包括新加坡）。马来亚华族于 1901 年时已达 419, 355 人，占总人口之 41.10%。1926 年乃华人移民进入马来亚之最高峰时期，该年马来亚共增添了华人

移民 228, 235 人。由 1900 年至 1940 年，曾经进入马来亚的华族移民共计 1 千 2 百万人。（林水椽、何启良，1998：xxiv）

以槟榔屿为例：1786 年 7 月 19 日，法兰西·莱特上校（Captain Francis Light）登陆槟榔屿之前曾经视察槟榔屿一番，在丹絨道光山麓一带，发现居民数名。（张少宽，2002：14）据卜克望（Bookworm）所著《槟榔屿开辟史》（Penang in the Past）所载：“最初岛上仅有华人及马来渔民 58 名。自开辟以后，居民逐渐增多，至 1788 年已增至 1 千名左右，其中五分之二为华人。”（张礼千、姚楠，1946：49）1804 年时，槟榔屿被提升为印度第四省区时，人口已达 1 万 2 千人。（张礼千、姚楠，1946：15）在进入 19 世纪时，槟榔屿乔治市（George Town）逐渐发展成为贸易中心，吸引各族移民涌入。华族移民寓居在槟榔屿及毗邻的威省，寻求经商和就业机会。他们大多数在城市充当劳工或零售小商人，有些则成为农业种植人，栽种香料及甘蔗。自 1881 至 1891 年间，槟城华族人口增长率达 6.3%。槟城的华人基本上分属为源自福建和广东两省的五个方言群，根据 1921 年的统计数字，依次为福建 64, 085（48.4%）、广府 30, 846（23.3%）、潮州 19, 236（14.5%）、客籍 14, 293（10.7%）及海南 3, 883（2.9%），华人人口总数 132, 343。他们也以各自落户时间的先后，手艺的粗细及工作经验的深浅而划分为“新客”和“老客”；或以出生地、婚姻及文化特征而分为“峇峇”与“中国出生者”。据 1931 年的官方户口调查统计，槟城的华人有 169, 510 名，其中 54% 是在英属马来亚以外出生者。但由于受到世界经济不景

气的影响，以及1931年马来亚实施“外侨登记条例”，限制华人入境的数目，遂使华人人口增长率停泄不前，本地定居华人渐行稳定。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叶钟玲，2009：3）

早期，分别居住在整個马来亚和新加坡境内的人数少过57%和40%是出生自当地。（Emerson, R., 1970：25）。马来亚华族移民多属男性。《1933年外侨法令》限制成年男性移入，妇孥则不在禁止之列。华族人口的性别比例于是得以改善，结婚率跟着提高，出生率也相应上升。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增加，移民的重要性便相对地下降。（导言，林水椽、何启良，1998：xxiv）

1921年，英属马来半岛之人口，共有335万8千人。华人占1,168,000人，马来人1,627,000人，印度人417,800人，亚洲各国人3,300人，欧亚合种人12,600人，白种人14,500人。（李长傅，1930：529-530）

（二）马来亚华人女性移民

19世纪之际，南来的移民绝大部分是男性，女性移民多半是被拐骗来的娼妓，导致当时的马来亚社会缺乏华人妇女。（崔贵强，1994：9）早期华人妇女的缺乏，使华社内部极为不稳定，移民中之已婚者固然想早回中国与家人团聚；未结婚者则想返国觅一配偶。只有在经济上无法返国的才愿与当地妇女结婚。（钟锡金：1984，37）到了30年代，政

府实行移民限制法令，限定男性移民数额，而妇孺却可自由入境，这一来，两性便渐趋平衡。（崔贵强：9）

表 2.1：马来亚华人男女比率（每 1,000 名男性）

州	年份	1891	1901	1911	1921	1931
海峡殖民地		238	286	355	479	612
马来联邦		64*	100	188	351	492
吉兰丹、丁加奴、吉打、柔佛				146	246	384
马来亚				241	384	513

*不包括彭亨

资料来源：陈爱梅，2009：378

范若兰将早期华人移民妇女分为三种类型，即主动迁移型、依附迁移型以及被动迁移型妇女：第一类，主动迁移型的中国妇女可分为，一是为谋生而移民马来亚的中国妇女（范若兰，2005a：84）；二是出于独立的意愿而出洋的妇女，这在自梳女和“不落家”群体表现最为明显；三是知识妇女增多。（85）随着马来亚华人女子教育的发展，女教师需求增加。20世纪20、30年代马来亚华文教育发展较快，需要大量合格的、能说国语的教师，华人女校校长和教师更是缺乏。（85）第二类，依附迁移型女移民乃占相当多的人数，她们要么随丈夫到马来亚谋

生，要么因丈夫事业有成而安家马来亚，要么是丈夫多年未归，只好出洋寻夫。（89）第三类，被动迁移型妇女是被人口贩子拐卖出洋的妇女或少女。（91）

第三节 马来亚华人经济

历宋、元以降，由于海禁甚严，流寓海外，悬为禁令，华人之来是邦，率皆属定期性之贸易，少有移居者，而自16、17世纪以还，马来亚在葡人、荷人武力角逐统治压榨之下，华人之经济发展，尤以农耕方面，更大受摧残。直到18世纪末叶，一方面由于海禁开放，一方面由于英人统治马来亚，慑于葡、荷前车之鉴，重视华人之开发能力，而采取鼓励政策，华人遂大批涌至，从事开发，而华人农业经济，乃得长足发展，导致繁荣。（华侨志编纂委员会，1959：139）

据 1794 年 1 月 25 日，莱特所写的一封信中指出：“华人是我们居民中最有价值的部分，男女儿童人口约有3千，他们之中有木匠、泥水匠、各种金属匠、商人、店员与垦殖者等，对当地贡献很重要”。

（巴素博士，1950：29）另据*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 一书中所述，华族参与的经济活动范围非常的广泛，计有演员、音乐家、书记、工程师、医生、校长、木匠、消防员、渔夫、承包商、理发师、生产商、画家、小偷等共 102 项。（Vaughan, J.D., 1879: 16）

马来亚的经济资源充裕，为热带各种重要原料之出产地。农业以橡胶为主，矿产推锡米为首位，两者皆占全世界总产量三分之一强，贸易、外汇皆以此利赖。（华侨志编纂委员会：1959，17）锡矿业是最具代表性的华人行业之一。20 世纪初，锡矿业和橡胶业是马来亚最大的经济支柱。根据 1911 年的年鉴报告，在马来联邦，超过 96%在矿场工作的是华人。（陈爱梅，2009：380）

早期的锡苗大都由马来人开采，由于缺乏有力的挖掘工具和方法而只能采集地表的些许锡苗，产量有限。因此当马六甲的华人富商因经济衰退而向外发展时，很快便取代马来人的地位，一跃而成为最强大锡矿开采者。（王国璋：1997，24）马来亚锡矿，其产量及输出量，一向居于世界第一位。19 世纪以前，马来亚锡矿业，几乎为华人所独占，在锡矿总产量中华人占据了 95%以上。（宋哲美，1964：85）迨至 20 世纪以来，欧人大量投资，锡矿业的霸权，始由华人之手转入欧人之手。

（86）

表 2.2：华人与欧人在马来亚锡矿业的百分比

年份	马来亚锡产总吨数	欧人占百分率	华人占百分率
1880	不详	-	100
1900	40000	5	95
1910	44999	12	78

续表 2.2

年份	马来亚锡产总吨数	欧人占百分率	华人占百分率
1920	37438	36	64
1921	36569	39	61
1924	46114	45	55
1927	54535	41	59
1929	6999	62	36
1936	64682	67	33
1940	60651	73	27
1941	66990	70	28

资料来源：华侨志编纂委员会，1959：157

20世纪初，由于汽车业的勃兴，轮胎的制造需要大量橡胶的供应，加上橡胶的使用越来越广泛，胶鞋、胶管、脚踏车轮胎、胶布以及医药品等等，在在需要橡胶，橡胶一时供不应求，刺激了橡胶的暴涨。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欧人与华人资本家都纷纷投资橡胶的栽植，胶园的面积约愈扩大。（崔贵强，1994：15）马来亚橡胶种植面积从1897年的345英亩，至1910年剧增到547,250英亩，到1920年时更增至2,206,750英亩。马来亚橡胶产量在1914年已跃居世界第一，至1920年马来亚橡胶产量高达17万7千吨，占世界产量一半以上。（安焕然，1998：

303) 在1920年代, 由于市场供过于求, 导致树胶价格曾经大受影响, 进而影响马来亚的橡胶业。但此后, 橡胶的价格曾一度提升, 这点可透过《叻报》的〈树胶销场最近状况〉观之“树胶为南洋第一实业, 其发展之程度, 全视世界之需要若何, 早前因供过于求, 遂有限制出产办法。1922年树胶价稍涨……” (《叻报》, 1922.1.3: 2)

表 2.3: 马来亚橡胶生产量

年份	生产吨数
1931	432731
1932	415284
1933	457985
1934	476994
1935	373183
1936	360178
1937	497435
1938	357323
1939	357900
1940	544315

资料来源: 华侨志编纂委员会, 1959: 18

华人经济作物的种植，始于18世纪末，最初出现在槟榔屿，以种胡椒、香料、丁香、豆蔻为主。后渐扩展至威省，种植甘蔗。再次则是在南方的新加坡、柔佛等地种植胡椒、甘蜜。1790年，檳城开始试种胡椒。胡椒种植在檳城一直兴旺了将近20年。1810年前，其年产量达400万磅，几乎全是华人所种。而香料豆蔻的种植，始于1798年。至1838年在檳城已有30家香料园，全由华工所经营。1853年，檳城香料种植面积3,800公顷，到1860年增至5,300公顷。惟至1860年以后，由于种植园受虫害的摧残，加上大量种植造成土地的贫瘠，种植者乃不得不另辟他地。于是他们渐往对岸的威省发展，从事甘蔗的种植。从1800-1846年华人一直拥有甘蔗种植的独占地位，直至1846年后，英资才投入。至于南部，新加坡的胡椒和甘蜜种植也几乎全属华人。后来由于甘蜜的种植侵蚀土地相当厉害，1840年新加坡的种植园土质已开始枯竭，可供应用的土地和森林已趋耗尽。是故，华人种植者遂纷至一海峡之隔的柔佛，故技重施。至19世纪60年代初，柔佛境内已有1,200个甘蜜种植园，雇佣华工将近1.5万人。英殖民者涉入马来半岛内地后，半岛西岸的森美兰、雪兰莪和霹雳等地，也掀起华人种植甘蜜、胡椒的热潮。（安焕然：1998，296-297）

但是自从“马来人土地保留法”¹⁴颁布后，华人在经济农业上的发展开始受到限制。例如：1930年马来联邦马来人土地保留法（The Malay Reservation Enactment, No. 18 of 1930）、1938年吉兰丹州土地保留法，

¹⁴ 马来人土地保留法是在1913年11月25日由英殖民政府定制和通过的。该保留法之后在霹雳、雪兰莪、彭亨和森美兰开始生效。（Harun, Abd. G., 1982: 78）

(Land Enactment,1938 ,Enactment No. 26 of 1938)等，都注明“包括马来人保留土地在内的国有土地，不可以卖给、租凭或以其它方式处理（除了不超过一年的临时使用执照）非马来人”（The Malay Reservation Enactment, No. 18 of 1930: 3）

除了锡矿业、橡胶业和种植业以外，华人的经济活动还涉及商业和金融业。华人商业偏重于独资经营，除批发商外大部分侧重于零售与小规模商店，其业务范围，遍布各大小城市，远及农村，尤以杂货店，咖啡、冰店等。（华侨志编纂委员会，1959：166）金融业是在马来亚华人有了一定的资本后，才开始涉及的领域。马来亚最早的银行是在1903年创立于新加坡的“广益银行”，至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全马来亚共创立了12家华人银行。（林远辉、张应龙，2008：322-323）

马来亚华人女性所涉及的经济领域，大体与男性相同。不过，早期华人女性多偏向从事洗琉琅行业。1900年之前，在霹雳，每五个工作的华人女性当中，就有至少一人是在矿场工作。另一项来自联邦矿务局的数据显示，矿务局于1911年在霹雳州发出7,119张琉琅准证，当时霹雳华人女性总人口是35,539。换言之，大约每五个华人女性当中，就有一人从事淘洗琉琅的工作。（陈爱梅，2009：381）

马来亚女性在农业上最容易获得就业机会。根据1911年的年鉴报告，就业女性中有69.3%从事与农业相关的行业，其中75.6%是马来人，

20.3%是印度人，而华人只占了 6.5%。随着机械化采矿的使用及矿业的萧条，在 1931 年，华人女性就业人口中 46%从事与农业相关之行业，其中的 54%在橡胶园工作。从 1910 年代开始，橡胶就取代了锡矿，成为马来亚最大的收入来源。在橡胶人力资源方面，华人也由 1907 年所占的9%提升至 1919 年的 26%。华人女性从事橡胶业的人数比率成长比男性缓慢，到了 1921 年才占了女性人力资源中的 5%，不过之后就呈快速的增长，到了 1931 年占了 9%。（陈爱梅，2009：382）20 世纪初期，另一项值得关注的华人女性行业就是帮佣，也可称为“妹仔”或“妹头”。1931 年，马来亚女性就业人口中有 10.2%从事帮佣。在华人女性当中，超过 50%从事帮佣行业者是海峡殖民地工作。在海峡殖民地工作的女性人口当中，53%的人是从事相关行业。1930 年代，“妹仔”获得殖民政府立法保护。随着就业机会的增加及经济模式的改变，华人女性从事帮佣的比率逐渐减少。殖民时期，华人女性多数在农业、矿业及帮佣行业中寻找她们的经济来源。女性从事的工作以劳力及非技术为主，除了当时的经济结构外，主要还是因为女性识字率低，使她们无法胜任其他的工作。（383）

1930 年代马来亚华人妇女的经济参与规模扩大，职业领域也增多，这是由于：第一，1930 年代马来亚经济的曲折发展为华人妇女扩大经济参与提供了机会；第二，1929——1933 年经济危机导致大量锡矿场和橡胶园倒闭，同时也促使华人投资方向的转化，很多侨资从单一的橡胶园或锡矿场转向制造业、食品加工业、房地产业等；第三，经济危机

导致移民政策的改变，促使中国妇女大量移民，1930 年代女性移民高潮为马来亚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增加了华人妇女参与经济活动的能
力；第四，华人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她们进入职业领域（范若
兰，2005a: 185-191）

第三章

战前马来亚华文教育发展

要了解马来亚华文教育的发展，首先需要追溯至中国古代教育机构的发展，即书院演变成学堂。这是因为马来亚早期的华人社会人士，都是直接将中国当地的同一套教育系统，运用在马来亚的华文教育系统和机构里。

中国古代上自先秦以来原有私人讲学的传统，因而有些地方私学渐多。（毛礼锐、邵鹤亭、瞿菊农，1989：328）书院产生于唐代初年（鄧红波，2005：2），其产生不仅是官学的衰落、禅林影响等，也是作为一种新型的讲学制度说，与社会经济基础有密切关系。（毛礼锐、邵鹤亭、瞿菊农，1989：328）书院的讲学在内容上不只是传授儒家的知识，还重视讲明义理，更注重把所讲明的义理，在身心修养上躬行实践。教师对于学生特别注重对个人的指导启发，学生亦特别重视道德修养。教师自身特别重视身教，以“人师”自勉自任。教者与学者间重视学术上的讲辩讨论。书院的学习不专重知识的传授，而重视合“理”的生活习惯的培养，教学上注意的不只是读书，而是教人如何“端坐”、“站立”、“走路”、“说话”等。（330）除了上述活动以外，还包括藏书、校书、修书、著书、刻书等活动的地方，进行文化累积，研究，创造，传播的结果。（鄧红波，2005：2）19世纪后期40年，书院以新

增 1037 所的超高速发展。而且，为了适应社会的日益增长并激剧变化的文化教育需求，引入了“新学”、“西学”作为研究与教学的内容，书院在这时期的改革是其由古代走向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历程。（728）

早期马来亚华人知识水平低落，他们大多是文盲或半文盲。这一事实，从早期华文报销途的呆滞，可见一斑。新加坡最早的华文报是《叻报》。据估计，介于 1883 年与 1890 年间，《叻报》报份的销数，徘徊在 150 份与 350 份之间。1891 年至 1900 年间，情况虽略有改善，但也很少超过 500 份。华人知识水平的低落，也表现在教育的落后。（崔贵强：1972，123）华文教育的发展，实始于 20 世纪初康有为南海亡命南洋之时。保皇与革命二党，在政治改革上虽对立，在开通华人智识，促进华文教育方面的努力则一。（庄泽宣，1953：49）

表3.1：马来亚华人识字率（1921、1931 年）（每一千人）

区域	1921		1931	
	男	女	男	女
新加坡	487	96	389	113
槟榔屿	524	87	448	119
马六甲	452	84	428	85
马来联邦	520	194	468	103

续表3.1

区域	1921		1931	
	男	女	男	女
马来联邦	520	194	468	103
马来属邦	454	139	379	65

注：1921 年数字为城市人口的识字率

资料来源：范若兰，2005a：161、162

第一节 学前教育

西方学童入小学的年龄以五岁或六岁为主，六岁以下的教育，即称为“学前教育¹⁵”（Pre-School Education）。（苏秀康，1996：1）

马来西亚教育部的相关文件注明，在马来亚半岛传授学前教育的幼儿园是在 1940 年代才开始发展并且首间幼儿园是由基督教徒所成立的，师资都是由不曾接受专业学前教育的训练同时没有相关经验之小学退休教师所组成（Yaakob, HJ Z., Sulaiman, M. & Jani, HJ N., 2011: 15）；新加坡则是在1900 年代开始设立了幼儿园（9）。另如由杨林所著的《东盟教育》则认为马来亚半岛的学前教育是在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

¹⁵ 福禄贝尔（Friedrich Froebel, 1782-1852）是倡导幼儿教育理念同时也是第一位设立了幼儿园（Kindergarten）的德国人。福氏所提出的幼儿园教育精神有四点：一、“内在外在化”及“外在内在化”，以前者为优先，二、教师应以儿童为本位，三、自然恩物最具教育价值，四、具浓厚的宗教教育观念（林玉体，2006：58-478）

正式出现¹⁶。（杨林，2009：159）

其实，早在 1915 年刘平根就在雪兰莪首创的坤成女子学校开办了幼儿园，同时由教育学者李中如就任第一任的校长。（钟佩琼，1957：32）新加坡的学前教育是在五四运动以后的 1921 年，由新加坡中华基督教会郑聘庭、陈令典二位牧师，倡办“星洲幼稚园”于丹戎巴葛路，是开拓新加坡华文幼稚教育的先河，该园在是年 10 月正式成立。（陈国华，1992：179）嗣后崇福女校（1932 年）、南洋女中（1934 年），均附设幼儿园，潮侨创办之建国幼儿园亦于 1938 年相续成立。（许甦吾，1949：23）

第二节 1920 以前的华校发展

在华教史里，早期私塾时代应该是以私立为其主流，在私塾师家里设帐，或请到学生家中设教，都是属于私立性质的；会馆、祠堂或公众人士联合礼聘塾师至公众场所设学，在教育不普及、学童不多的草莱阶段，应该不流行的。清季末叶以后，特别是在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一方面私塾纷纷改为学堂，由众人合办；一方面新式学校林立，由社会领袖倡议、领导，于是，新式学校乃成为时代的主流，取代了旧时私立学塾的地位。（郑良树，1998：174）

¹⁶ 书中指出学前教育起初都是由私人或团体在城市地位开办。到了 60 年代，学前教育开始受到家长的重视，幼儿园在各地纷纷设立。这些幼儿园多由宗教团体、个人组织兴办，收费昂贵，是为富家子弟服务的，以英文和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杨林，2009：159）

远在 19 世纪初叶之际，私塾教育已经在华族聚集的檳榔嶼，马六甲及新加坡等地陆陆续续地出现了。这些没有正规的制度，没有正式的课本的私塾教育，相信早在 18 世纪末期之际，极可能最早出现在马六甲、尔后是檳城及新加坡等地区。虽然缺乏实际的资料，但最早有据可考并具规模的华校是于 1819 年设立在檳榔嶼的五福书院，之后有迹可寻的华校还有崇文阁（1849）、萃英书院（1854）、道南学堂（1872）、唐文义学（1873）、华英义学（1885）¹⁷、毓兰书室、广肇义学、乐英书室、马车路尾义学（1889）等。（郑良树，1998：9-37）这些早期存在于马来亚的华文教育，其形式皆为中国传统教育的延伸。纵然到了 20 世纪初，华教工作还是在旧式的小型学习场所进行。（林水椽，2005：350）

从 1901 年开始，满清政府便采取各种措施，进行改革旧教育制度。马来亚则于 1904 年建立了近代学校制度。（林水椽，1998b：2）1904 年，南洋学务大臣张弼士于檳城创办了马来亚第一间新式华文学校——中华学堂。（方起驹、杨耀宗、金永礼，1984：332）檳城中华学堂的建立掀开了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新的一页，随后全国各地华人竞相仿效，纷纷成立新式华文学校。旧有的私塾等也一间接着一间地改为新式学堂。（林水椽，1998b：219）紧接着中华学堂而设的有新加坡广帮的

¹⁷ 华英义学又称为颜永成义学。在郑良树（1998）。《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分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4 内注明成立于 1886 年。但据 Dabbs, D. M. (1994). *History of Gan Eng Seng School*. Singapore: Dabbs, D. M., 124 及 Bahadin, K. (1996), *History of an English School-Gan Eng Seng School 1885-1996*. (Unpublished B.A thesi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13 内认为是颜永成义学是成立于 1885 年。

养正学校（1905）、中华女校（1911）、崇正学校（1905）、客帮的应新学校（1906）、潮帮的端蒙学校（1906）、福帮的道南学校（1907）、琼帮的育英学校（1910）、茶阳会馆的启发学校（1906）和宁阳会馆的宁阳夜校（1906），槟榔屿客帮的时中学校（1908）、邱氏新江学校（1906），吉隆坡的尊孔学校（1907）、坤成女校（1908）、大同学校（1911），加央的育华学校（1910），霹雳的育才学校（1908）等，相续创办。（林远辉，1981：242-243）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满清政府崩溃而民国宣告成立，改革旧制，建立新学制。马来亚华人热烈响应号召，开办新式学校，尤其是女学。檳城方面，在短短的10年内，增办20余间华校，包括钟灵、福建女校、璧如女校、务本女校、毓南、慕义、培南、益华、颍川、台山、育才、崇德、华侨、商务、慕义等校。1917年，中国教育部派黄炎培、林鼎华南来调查华文教育，鼓励华文学校向中国教育部立案。（叶钟玲，2009：4）

于1916年，华人社会深感商业日趋发达，实有造就商业人才的必要，于是吉隆坡尊孔学校校长宋木林（又名宋森）将该校高等小学改办为商业班。尊孔学校这一措施，为马来亚华校注重实用教育起了带头作用。其后，马来亚、新加坡各地华校闻风兴起，附设职业实习教育的计有：柔佛新山宽柔学校设立五七公司、怡保育才学校设立学生贩卖部、吉隆坡坤成女校实行职业实习等等。（陈国华，1992：130-131）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华语普遍成为教学媒介，而白话取代了文言。早期的华校，多是设立在方言群会馆之内，所以当各校开始使用白话教学后，各方言学校顿时门户敞开，由原本只为自己的方言群办校，转而成为以全体华人子弟为服务对象。（郑良树，2005：365）

英殖民政府眼中的华文教育既不符合政府之意愿，又无利益可图，因此并无意加以提倡。（Lim, C. K., 2008: 614）因此，当时英殖民政府对华文教育漠不关心，让其自生自灭，不加干预。（沈慕羽，1995：2）对华人而言，也乐得利用这种空间充分发挥自办教育的精神。（林水椽，2010：517）载至1920年止，马来联邦共有华校181所，而海峡殖民地则有华校313所。（林水椽，2005：348-349）

第三节 1920以后的华校发展

然而当政府看到华校的发展势头非常强盛，又担心华人通过华校宣导反英殖民政府，〈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因此而颁布。英殖民政府颁布的〈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其意图非常明显，那是不再让华校继续自由发展，把阻止华校从事於宣传政治意识看得比提高教育素质更为重要。此项措施正与华人意愿背道而驰。华教人士即为此与政府发生冲突，反对之声四起。（林水椽，1999：110）如在《叻报》之〈关于教育新例文件〉载“因议政局提出管理侨学议案，致为各校反对，还有待遇过苛之处，自难忍受”（《叻报》：1920.10.1，6-7）

1920 年学校注册法令一公布，群起反对，但没有成果，其中奔走最力的余佩皋、钟乐臣、庄希泉、陈新政等还遭到被递解出境的命运。

（汤利波，1982：59）注册法令实施后，立即有 10 多间华文学校被取消注册。（林水椽，1998c：64）1921 年槟城华侨中学停办后，新马两地的华文中学只剩星洲一所而已。（叶钟玲，2009：16）

英政府於1924 年开始也对华校实施津贴制度，这个措施对华校的发展有一定的帮助。（王品棠、徐柳常，1985：26）1925 年英殖民地政府在学校注册法令条款，再加一项修正案，赋予教育总监权利取消参与颠覆活动的教师的注册，并禁止采用含有反英政府内容的教科书。1925 年至 1928 年之间，估计最少有 315 间华校因违反学校注册法令而被关闭。1929 年英殖民地总督金门泰（Cecil Clementi）对华校采取更严厉的措施，规定所有华校教师必须是在马来半岛出生，否则将不获准注册。（莫顺生，2000：18）

1937 年整个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共有华校 1216 所，学生 9.4 万多人。（林远辉、张应龙，2008：495）1941 年底日本军队南进，占领马来亚，由于华文教育背景的人士具有强烈的反侵略，反帝国主义及反日思想，日军对这些人早有戒心。一到马来亚后，便对华教人士进行迫害，无数的教师和学生惨遭杀死。华校有的被兵燹所毁，有的遭到日军占领，改为兵营民房。（林水椽，1998a：231）

南洋华文教育既如上述，量数虽各有客观，质的方面不免尚差，其原因不外乎是各自为政，乏而无统，或董事校长任用私人，或因陋就简，种种弊端，颇为不少。盖无教育会之机关为监督领导，亦无中国政府视学员为之纠正，且各校经济概係自筹，既无资助财力，虽有教育会亦等于无。（陈嘉庚，1946：21）

第四节 华校的经济来源

华校并没有一个能够稳定维持的经费支援，因此它们有各种各样的经济来源，其中包括商会、会馆、年月捐、税捐、神庙义山、学费、基金入息、向中国或本地政府的申请津贴（林开忠，1992：43）、举办各种游艺会或者购置屋地以为校产（郑良树、魏维贤，1975：15-16）了。抗战前夕，南洋各地华侨学校共有3千多所，学生数10万人。这些侨校的经费，都由华人自己捐募。（王增炳、余纲，1981：67）

向华人社会或者当时比较有钱的华商、会馆募款的，如在1919年3月21日开学的南洋华侨中学，是当时全南洋规模最大的一所华文中学之一。（王增炳、余纲，1981：67）南洋华侨中学的经费不足，除一度由陈嘉庚支持，先后付出10余万元外，福建会馆也拨款资助，中华总商会则每月津贴数百元，以补经费之不足。（68）璧如女学的学校经费完全由梁思权和梁德权一家所独立负担（黄尧，2003：80）以及陈嘉庚在其《南侨回忆录》中道：“各校经费概向侨商捐筹。学生每人自缴一、二元，小学多男女同学……”（陈嘉庚，1946：204）、《叻报》的〈应

新学校建校筹办处启事》“本筹办处为劝捐建校经费节次派员向殷商筹款，多蒙慷慨捐助……”（《叻报》，1920.9.29：2）、“1938年初，陈嘉庚在新加坡创办一所水产航海学校，招生三班100余名，经费由福建会馆承担……”（王增炳、余纲：68）等。

或者有更多的是通过表演戏剧募款，如《叻报》的〈寻求筹款的南洋女学校演剧筹款启事〉（《叻报》，1920.10.6：2）、〈南洋工商不惜学校之乐观〉：

……因丹戎巴葛一片地方，未有学校，贫苦子弟，求学无从。咸有向隅之叹。少数热心爱国之士，一视同仁，不忍此莘莘学子，坠于不教不育之方，乃贸然提倡，建设学校于是方……经济困难，亦不敢遽然放弃……今幸伍总领事及诸大慈善家，不忍办学诸君，拮据为难，是以有发此文明戏剧之配演，借作现身说法之场所，冀诸亲爱侨胞，携手同来，扶此颠危之学校……（1920.9.30：2）

又如叶钟玲在《槟城钟灵中学史稿（1917-1957）》里载道：

1930年1月，槟城阅书报社欢迎闽南过速团，于20及21两晚，在上海戏院表演国术，为钟灵中学筹募经费。这是钟中首次对外筹款活动。为配合演出，钟中亦临时组织戏剧团，表演笑剧‘到民间去’，其旨係宣传平民教育……收入共达3,352元……（叶钟玲，2009：37）

早期的华校就是在接受来自各方的经济支援的情况之下，得以继续生存。而未能筹集足够经费的华校，唯有走上关闭学校一途而已。

第五节 华校的课本

自创始以来，华校即须依赖由中国输入的课本。（William Wenn , Wu T. Y. : 1951, 15）旧式的私塾教育课程有《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幼学诗帖》、《孝经》、《四书》（陈育崧，1984a: 217）、《五经》（Lee, T. H., 2011: 4），再加上尺牍、珠算（郑良树，1998: 43）及书法等；教学媒介语则以方言为主。（陈育崧：217）

中国新式小学教育兴办以后，其课程经过三次修改，即 1902 年的〈钦定学堂章程〉、1903 年的〈奏定学堂章程〉以及 1910 年的修订方案。（郑良树，1998: 92-94）由新马人士所创办的学堂，多数接受了 1903 年由张之洞、张百熙、荣庆联合定制的〈奏定学堂章程〉（97），其课程多是根据中国的章程而安排。

据《坤成百年校史汇编》编者之一黄玉莹认为，坤成早期的课本是采用日本横滨大同学校（现为日本横滨山手中华学校）在 1902 年所推出一套共 6 卷，每卷 50 课的《小学新读本》¹⁸。内文如下：

¹⁸ 《小学新读本》与《幼稚园新读本》是由横滨大同学校当时的校长林慧儒（林奎）参考欧美与日本等各国小学课本等编写而成。日本教课本书，是当时使中国历史教育走出私塾模式，确立新式教育的根源。《小学新读本》内容广泛，中心思想明确，“每篇课文都有丰富的寓意，暗含了尊奉孔教、尊师敬长、勤学立志、忠孝等思想，教育学生做人要正直诚实、助人为乐、尊老爱幼、文明有礼等品质。”林慧儒是康有为十大弟子之一，当时与徐勤、钟卓京等人从中国到该校“教习”，因此该校是贯彻康梁思想的。（黄玉莹、李亚遨：2010，139）

坤成创于 1908 年 9 月。事实证明坤成创校之主导人物，是兼任首任校长之钟卓京。我们无确凿证据证明坤成亦曾以《小学新读本》作教材，但从钟卓京的政治背景、时间上的紧促以及此套课本在当时的流行度与影响力来考量的话，坤成自编新课本或选用另一教材的可能性似乎微乎其微。何况，钟卓京出任神户同文学校校长（1902-1903）和横滨大同学校校长（1904-1907 年年初）时，两校采用的正是此套课本。（黄玉莹、李亚遨：2010，140）

早期的华文课本以文言体为文字，一直到1904年在槟榔屿设立的中华学校，是新马新教育的开端（陈育崧，1984b：262），实行华文教学¹⁹，这在新马华校中，还是较早的。

据《新国民日报》在 1921 年 2 月 3 日，第一页所刊登的广告可见当时新加坡商务印书馆所编及售卖的《新法教科书》，共分为国民学校以及高等小学校所使用的教科书以及教授案²⁰。当时华文学校所使用的课本还是充满了中国的色彩和文化，尤其是“历史”及“地理”这两科。书内介绍的，百分之一百是中国历史及中国地理。（郑良树，1999b：85）

1940 年 3 月，马来联邦华文教育厅为改善华校小学教育，成立小学课程修订委员会，林惠祥亦获邀担任委员。他对小学课程的问题，提出以下的看法：“华校的上课时间，应当比各色（语文源流）学校为多，因为英校只读英文，巫印学校虽也要加强他们本族的文字，但印巫

¹⁹ 详见陈育崧（1984b）：〈马来亚华侨新教育的发轫——槟榔屿中华学校创立经过〉。载椰阴馆文存编委会【编】，《椰阴馆文存》第二卷。（页 260-270）新加坡：南洋学会。

²⁰ 国民学校使用的教科书课程有修身、国语、国文、算术、唱歌；高等小学校的课程则有修身、国语、算术、历史、地理、理科。

文字是用字母拼音的，研习比较容易，上课时间如果减少些，是不打紧的。至于华文，是比较艰深难学的，所以对于上课时间，需增多些；又因在环境上的需要，英文的上课时间，是不可以减少的。在这英国属地，英文是很重要的，而应注意研究。再有一点就是关于‘常识’一科，是一般小学生所应具备的知识，这应当受注意才对。”4月24日，林惠祥和其他委员，一同参与在吉隆坡举行的小学课程课程修订委员会，以拟订华校小学授课时间，尤其对于“公民”、“常识”各科及“史地”等课程，据理力争。同年10月，海峡殖民地华文副提学司维廉氏所公布委员会所议决的小学应授科目及各科授课时间分配表，接受林惠祥的意见。（叶钟玲，2009：69）

第六节 师资的来源

早期的华文学校，教师缺乏，他们之中有来自算命或风水先生，书信代写人及其他能顺利地读和写的人士。（林水椽，1998c：61）新式华校开始出现后，即由一塾师唱独脚戏的私塾变为校长及多位教师负责管理和授业的多班级学校。（63）据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里载道：“……与民国十年以前大不相同，本省华人所办学校，多用本省人，不复如前须向上海远聘。”（陈嘉庚，1946：20）由此可知，早期的华文教育多雇用来自中国的师资，后期的华校多聘请来自马来亚的师资。

南洋华侨师范教育的萌芽，当为1901年（清光绪27年）广西知事刘士骥假平章公馆创办的槟榔屿师范传习所，此为六个月毕业的速成

班，共开班两期，目的是为“年长精通国文，欲为小学教员之人士补习师范”所招收的学生，除马来亚外，兼及爪哇、仰光等地，可说是南洋华侨师范教育先河。（叶钟玲，2009：3）槟榔屿师范传习所所提供的学科计有：伦理学、教育学、教育史、教授法、管理法、心理学、论理学、哲学大纲、国文、英文、数学、历史、地理、手工、图画、理化、博物、生理卫生、乐歌、体育、教育研究、实习参观。（11）

第四章

华人女子教育的发展及战前华校所传习的文化

19 世纪是东西文化，特别是中英文化交锋和整合的时代，英国文化随着维多利亚政治和经济势力的膨胀而涌入东方，新马和中国都在它的笼罩之下，形成了复杂的三角关系：一方面是英国文化输入海峡华人社会，中巫混血后裔因此走向西化；一方面是英国文化输入中国，有识之人因而建立一套融合中西的改良主义思想；一方面是中国两元性的维新思想输入海峡华人社会，激起知识分子迅速回应。（李元瑾，1995：273）1900 年以后，由于受到来自中国的新思潮，如民族主义的冲击，华社也开始从乡民社会转变为具有较高现代民族意识的社会。华文学校与华文报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冲淡了华人的帮派思想，改变了帮权政治方式，也促进了更具包容性的自愿组织的出现，如不拘籍贯的现代学校（甚至是女校）、精武体育馆、商会、各州的大会堂等。（孙和声，2007：38）

自历史跨入 20 世纪，几乎每次社会的革命都要带来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辛亥革命如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如此、新民主主义革命亦是如此。人们在惊喜地发现妇女的地位在一步步提高，妇女拥有的权利在增加。（张岩冰，2001：190）在此之前，世界各地的女子教育就被提倡，在 20 世纪以后，华文女校开始在马来亚建立。女校建立的理由，除了国

家强弱与母语教育的关系外，也包括扶正社会风气及不良风俗、培养爱国意识等。（黄贤强，2004：45）语文不仅仅具有讯息传递的作用，由于成熟的语文需要长时间的文化积累、沉淀，因此往往代表着一个民族文化的精髓，成为凝聚族群意识的最佳工具。（曹淑瑶，2005：295）

“文化”一词，是人类的生活经验，因此很难以一个单一的意思为其定位。（Edgar, A. and Sedgwick, P., 2006: 1）文化自有自己的秩序，又因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变化。（张文娟，2007：45）一个社会或者一个人所认同的文化，是该社会或该个人经过长期对多种文化交流的结果，在这交流过程中，是一个社会或一个人对各类文化的取舍程度，则决定于客观环境里许多不同的因素，因此，不管一个人是通过任何语文或渠道接受不同文化之影响，最终也只能形成一套自己认同的价值观。文化的重要性，在于它决定了整个社会或个人思考的模式，这包括选择、判断、决策及实践各层面。文化中所含的价值观，会左右社会经济活动的原则，像如何看待正义、公正、冒险和机会等。进步的文化特别强调未来、亦即要有高瞻远瞩的愿景，例如儒家价值观里重视未来、工作、成就、教育、奉献、勤俭等。（许福吉、陆锦坤，2010：2）

文化与教育是互相影响的。（王品棠，1985：16）如果说文化是民族的根本，那教育就是维持这个民族特性的最好方法（何国忠，2003：xxxvii），也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的工具（王品棠：19）。华教作为华社的公共事业，是为承传民族事业、凝聚华人族群意识集体认同的

有机载体。（安焕然，2009：42）华族对教育与文化的重视是有目共睹的，当一个社会发展到某一程度，在文化上必有相应高层次的要求。（廖文辉，2007：18）华文教育的文化传承功能，主要表现在：第一，语言文字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学习汉语汉字就是接受中华文化熏陶；第二，语言文字又是文化传承的媒介，学会华文就为传承中华文化提供捷径；第三，华文作为符号文字具有自己的特点和优点，有利于东南亚华人学习中华文化。（张亚群，1996：8）

林开忠在分析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运动中有关文化的论述时得到如下结论：（一）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因此文化是民族的灵魂，而中国文化包括中国古代的典籍传统所提倡的哲学思想、人生观、道德遗训与价值观念等。（二）华人就是指认识中国文化、华人习惯和传统者，而且他必须在生活上与固有的民族特性有一致的表现，以保持传统、习惯、制度和仪态。（三）母语是进入民族文化最便利和最有效的工具，因而中国文化的发扬必须透过完整之华文（母语）教育体系之维护与发展。（四）马来西亚文化是指在不受压制的情况下，各民族文化自由交流的自然产物。华人在马来西亚必须付出政治上的认同，但在文化上却必须保持对中国文化的认可。（林开忠，1992：103、104）

郑良树则将马来西亚中华文化分为四个阶段：兴起（18世纪末期至20世纪20年代）、承续（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转型（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合流（20世纪60年代至今）。（郑良树，2005：363-

372) 笔者想要讨论的正是郑良树所提出四个阶段中的兴起以及承续阶段之马来亚中华文化以及文化。

第一节 华人女子教育

从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初，可以说是马来亚华人女子教育的发轫期，教会女校在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华人女校则为海峡华人女子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范若兰，2005a：114）最早设立的女子学校，据说是一位英籍女子 Miss Grant 于 1825 年在新加坡所开办。1884 年，第一所由殖民地政府开办的女校是莱福士女校（Raffles Girls School）。（黄玉莹、李亚遨，2010：131）

南洋华人提倡女教，并不是始于民国时期，而是清末年间。（黄贤强，2004：45）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 30 年代，华人精英一直大力提倡女子教育，许多女校的建立就是男性精英倡导和身体力行的结果。

（范若兰，2005a：154）1885 年，新加坡闻人胡亚基提倡女孩子要上学念书，他公开表示愿意承担每一女生每月 4 元学费。他是新加坡华人社会提倡女子受教育的先锋。（陈国华，1992：41）

另如，林文庆于 1899 年组织一个委员会，发起创办新加坡中国女子学校（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并于 1900 年正式开学，这是南洋华人创办的采用中英两种语言混合课程的第一所女子学校。（陈国华，1992：53）由于这间学校办学非常西化，且校长是一位英籍妇女，

所以一般上都没把它摆上开华校先声的地位。（黄玉莹、李亚遨，2010：131）

光绪 32 年（1906），当时的新加坡总领事孙士鼎视察本区侨校后的报告指出：“坝罗有女学校一所，为闽商胡国廉倡办。”（陈育崧，1984b：238）又《槟城新报》之〈州府近闻〉载：

霹雳女学之进步吡叻普通女学校自胡君子春等倡设三载于兹成效颇著近日学部已颁给女学章校中一切规模欲扩充改良以臻完备惟扩充校舍添购书籍增聘教员等事需费颇巨闻昨日余君彦臣由星架坡返吡叻道经本埠素热心公益绅商叙及其事即日捐助数百金以为扩充改良之资南洋风气之开女学前途日求进步想我中国前此二百兆女流住于黑暗世界者自兹以往非复吴下阿蒙矣。（《槟城新报》，1907.6.22：3）

由上述内文所载可知，于 1905 年在霹雳有一间由闽商胡国廉所倡办的女学校，这间可说是最早的华文女学校。（黄玉莹、李亚遨，2010：131）

除了上述所提及的以外，还有中华女校、南洋女校、南华女校等等也是由男性精英所建立的。陈嘉庚、胡文虎等人更是捐巨资兴办女校。（范若兰，2005a：154）

1907 年晚清政府颁布《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三十六条》和《女子小学章程二十条》，将女子教育正式纳入教育体制，这对中国已发展了数年的女子教育实践是一个肯定也是一个促进，在中国的影响下，海外华人社会也兴起开办女校的热潮，1911 年第一个以中文教育为主的女

子学校在新加坡建立，是为华侨女校。（范若兰，2005a：114-115）

往后在马来亚兴建的女校越来越多，女子教育蓬勃发展，计有中华女校（1911）、华侨女学校（1912）、纯德女校（1913）、三育学校（1913）、德育女学校（1913）、群贤女校（1914）、崇福女校（1915）、汉英女校（1915）、崇本女校（1916）、南华女校（1917）、南洋女校（1917）、明心女学校（1920）、静方女校（1928）（崔贵强，1994：160）、务内女学（1912）、璧如女学（1915）（黄尧，2003：80）等。上述女校中，有些规模很小，租赁店屋充作校舍。（崔贵强，1994：160）马来亚华文女校在20年代迅速增加，到30年代无论在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取得更大发展。从女校数量上来看，据不完全统计，1941年以前马来亚华文女校累计有50余所，成立于1920年代以前的有10多所，1920年代建立的女校数量最多，有20余所，1930年代建立的女校数量最少，只有不到10所。（范若兰，2005a：121、122）

在1920年代以前，女子教育规模很小，每个女校学生数量一般只有数十人，1920年代女生有所增长，大部分学校仍是数十人，少部分学校学生超过100人（南洋女校、崇福女校、福建女校、爱群女校、霹雳女校等），到1930年代，很多著名女校的学生人数都超过数百人，甚至上千人。一般女校也有学生上百人。（范若兰，2005a：122）

华文女子中学直到 1930 年才出现，是由南洋女中所建立的三三制高初级中学。初中教育虽在 1920 年代已出现，是坤成女校 1925 年所设立的初中部，但坤成女中于 1940 年才设立高中、化南女校 1929 年设立初中、霹雳女校 1933 年设立初中、协和女校 1939 年设立初中等。马来亚华人女子中学教育的普通发展是在世界第二次大战以后才正式实现。（范若兰，2005a: 130）

表 4.1: 海峡殖民地和马来联邦华文学校学生（1931——1937 年）

年代	海峡殖民地			马来联邦		
	男生	女生	女生占	男生	女生	女生占
1931	-	-	-	14394	4488	23.77
1932	16533	5495	24.95	14384	5446	27.46
1933	18376	6477	26.06	16475	5795	26.02
1934	21451	7423	25.71	18852	6892	25.84
1935	24178	8308	25.57	21706	7822	26.49
1936	26985	9674	26.39	24998	8828	26.1
1937	29673	10620	26.37	28855	10845	27.32
1938	34373	12794	27.12	32272	12095	27.26

资料来源：范若兰，2005a: 128、129

时代的变迁使得女子教育崛起，以提升女性在社会、职业的地位以及改变社会性别关系，但当时社会各界的人士并不能在短时间内接受女子上学受教育。根据郑良树研究所得，早期华人女子教育绝大部分都普及于市区内或大城市中，反观郊区及小乡镇都不见有女校，这与男校普及设置的情形完全不同。（郑良树，1998：257）这一现象与当时风气未开，民情保守有关（259）。虽然当时经历女权、五四等新文化、新思想的社会运动，但是对于生长于当代的家长而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有观念依然根深蒂固（257）。所以尽管1930年以前女校的数量甚多，求学者却有限。1930年代以后女子教育在数量以及质量上都大大提高，这表现在接受教育的女学生人数增多，还表现在女子接受更高级教育的机会也增多。（范若兰，2005a：110）

华文女校的课程大体上与普通华校一样，只是女校会比普通华校注重培养女生的学习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范若兰，2005a：138），所以会再额外加上适合华人女性的课程，例如譬如女学就有刺绣与图画课（黄尧，2003：80）。

华文女校为解决经费不足，也采取和普通华校一样的措施，一是呼吁华人社会各界慷慨捐助（范若兰，2005a：148）、二是向殖民地政府申请津贴、三是演剧筹款（149）但其筹款收效并不能与普通学校相比来得好，早期的华文女校常受经济问题困扰，校龄短浅（崔贵强，1994：160），如养正学校女子部：

1926年养正学校增设女子部……翌年既因经济困难而停办，幸社会热心者，感女子教育之重要，出而鼎力维持，另组静方女校……该校继续发展，声誉日增，至1942年，日军南侵而停办。（《养正学校金禧纪念刊》出版委员会，1956：29）

1941年以前多数的华文女校除了面对经济问题、创办者对于设立女校缺乏信心，如武昌女校等问题以外，聘请适合的教师也是早期女校面对的另一个困境，如槟榔屿中华女校正是因为教师难聘而停办。（黄尧，2003：80）所以为解决师资问题，华文女校在开办伊始，女子师范教育就随之兴起，如南洋女校（1917）、南华女校（1918）、中华女子学校（1934-1941）等，都在学校内附设简易师范班，这也成了当时马来亚华人教育的“特色”之一。直至1940-1941年，中华女子学校才设立了高级师范班。（范若兰，2005a：132）

第二节 战前华校所传习的文化

1900年之前的马来亚华社，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是中国的乡民社会（peasant society）在马来亚的移植与复制。而这个乡民传统主要是个以地方神祇和宗乡文化为主的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而非中国的精英式大传统（great tradition）。易言之，流行于中国，尤其是福建、广东二省的乡风民俗很易在本土的早期华社（也称为迁民社会或侨民社会）中重演——虽然也会因时、因地、因势制宜地有所调整。（孙和声，2007：37、38）而一个社会文化表现好坏的决定因素在于教育的普及以及其民族对文化的认识。（何国忠，1995：163）

中华文化自古以来都重视教化。（黄松赞，2005a：364）而中华文化在中国受到来自西方的自然科学，机械文明，民主思想，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挑战，产生恒古未有的空前自我变革（Self-renewal）。也就在同一时期，华族移民带了自己的语言，伦理道德，人生哲学，宗教思想，价值观念，以入世的奋斗精神，超越了南中国海，到了马来亚这一个新天地，在这里没有春夏秋冬之分，没有士农工商而以士为首的社会结构，没有原来的司法制度，没有学而优则士的阶梯，没有一个单元民族的农业社会。换句话说，到了马来亚的中华文化，已经脱离了以上各种足以影响，或保存原有中华文化特性的种种因素。（赖观福，1982：3）早中期的华人从中国带去的多是民俗式的中华文化。（黄松赞，2005b：379）

部分学者认为代表中华文化的是以儒家为主，如萧遥天²¹，但笔者认为中华文化应该不等同于或者只是局限于儒家思想而已，就如廖文辉所言：“人们往往不及深思，把儒家思想等同中华文化，以为中华文化就是儒家思想”（廖文辉，2007：16）笔者认为儒家思想只是属于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而已。

笔者赞同郑良树对文化的看法，他认为一般上文化可以分成三个层面：基层文化、中层文化及高层文化。高层文化是文化的核心，它都是一些精神上的文化，伦理道德、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都是这个层

²¹ 萧遥天认为代表中华文化的以儒家为主，杂家为副（萧遥天，1982：9）儒家思想是中华文化的本质（10）

面的文化。中层文化及基层文化²²是文化的外围，国家法律、风俗习惯、社区关系及家庭组织等，是文化的外围组织。（郑良树，1976：133）

（一） 课程与文化

如前文中提到，义学或私塾所采用的课本与学制，大体是因袭中国的，启蒙的孩童开始便要学习《三字经》与《百家姓》，接下来是诵读《四书》、《五经》。此外还要学写信札，诵读经书以及学习算学之类等课。义学课程着重于传统思想伦理之灌输（崔贵强，1994：155），这些都是属于非常中国化的文化，即属于郑氏所说的高层文化。华人的伦理价值有针对（一）个人方面的：勤俭、敦睦、朴实、信守、情操的修养和升华；（二）家庭方面：孝慈、祥和、仁爱、友恭、和穆，在品德上是具有约束规劝的力量的；（三）对社会方面的：仁义、廉耻、友善、谦和、乐群、无私等，在公德的维系上是有很大的作用；（四）对国家民族方面的：忠勇、和平、牺牲等。（萧遥天，1982：27）就如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中提到“南洋华侨无所谓教育，其时学校甚少，虽有私塾亦极有限……既乏中国文化。”（陈嘉庚，1946：204）之所以说“缺乏中国文化”，是因为中华文化应该是更广泛的，不仅限于精神思想而已。所以可以说在新式学堂成立之前，作为传播和教育中华文化的私塾，其功用是不够全面的。

²² 中层文化如，中秋节、端午节、华人的婚礼习俗等；基层文化如，使用筷子、路边的酿豆腐等。（郑良树，1976：134）

若参照在保皇及革命时期所编制而成的《小学新读本》课程目录（参照附录表 7.1），其内容不仅有宣扬中华文化伦理价值的子孝父母、兄弟正直、敬长、敬师、怜老人等外，还多了许多常识类别的课程，如鸡蛋、电灯、马车、象、脚车、野兔等。华文教育已经不再拘泥于追求中华文化伦理价值的学习，而开始走向生活化，即教授学童生活上所见的常识。

与陈嘉庚所言，早期马来亚的私塾“乏中国文化”，巴素也认为早期的华人社会没有受到充分文化的发展，而早期的华人所带来的中国文学及艺术文化是微乎其微的，大抵是四书之类。（巴素，1950：65）同时，郑良树也认为无论私塾或华文小学，它们所带来的中华文化毕竟还相当浅薄和粗糙，私塾课程谈不上什么高深的中华文化；至于新式的华校，课文浅白，内容简单，除了教导儿童识字以及一些普通常识之外，也谈不上传播什么高深的中华文化。（郑良树，2005：365）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马来亚华校所传习的中华文化，不再只是单纯的精神思想类别文化，还参杂了其他的中华文化，譬如中、基层的华乐、戏曲文化，这一点可由《叻报》的〈看看孔圣诞日养正学校之音乐大会〉：

十月八日为本校音乐大会之期。是日特延请坡中有名之音乐家，演剧家莅场助庆。而本校乐队亦备有多种游戏及歌曲，其内容分为：广府乐、潮福乐、军乐、弦乐、声乐、陶乐、游技跳舞、广府戏、白话戏等……（《叻报》，1920.9.29：2）

接着再看设立于 1919 年的槟城华侨中学（现钟灵中学），该校经历了 1920 年教育法令，并逐步发展出属于自己的课程，华侨中学学生所修的学科计有修身、国文、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乐歌、体操。1920 年，除依部章应用科目外，如国文、英文，还加授商业文件、算学则重簿记及商业实用算学，余如打字、图案画、商业知识等实用学科（叶钟玲，2009：10）

1927 年后，增加演讲比赛，爬山运动、提倡体育如篮球、排球、田径也开始受到重视，新式棍棒操、短棒操。1936 年开始，体育正课国术操记有单刀、行钩、查拳、风波棍、昆吾剑、埋伏拳等，（60）课外运动如春季田径赛、夏季篮球赛、秋季足球、冬季羽球、乒乓。校内比赛如爬山比赛，游泳比赛，运动会，篮、排球赛，自由脚比赛，足球比赛，国术表演赛、越野赛跑，羽球比赛，乒乓比赛，竞走比赛（59）

据槟城华侨中学课程发展观之，其课程中除了中国原有的授课内容之外，在当时，马来亚华校已不再只是单纯的教授中国文化，而开始传授西方教育文化的内容如物理、化学等。学校课程也从占绝大多数静态的教育活动，发展为动态的户外活动，如体操、篮球、足球、排球、爬山、田径等，尤其篮球、足球、排球等原皆属于外国的文化因素。除了融合中西文化的教育以外，该校亦在 1936 年的体育课内容里开始了单刀、行钩、查拳、风波棍、昆吾剑、埋伏拳等的中国国术文化活动，但是早期的中华高层文化在此时已经淡化了。

综上所述，与私塾时期的课程纲要相比较，早期的华校是属于完全静态的中国化高层思想精神文化，其后经历各种不同的思想主义及政治干预的影响之下，马来亚华文教育也与其他很多国家一样内增添了西洋化的教育文化色彩，紧接着逐渐发展为融合了更多中、基层的中华与西方，顺应社会大环境的文化，换言之是属于当时英殖民时代的马来亚“本土文化”。

若只单以 1941 年以前的华文教育经历的文化变迁，笔者认为它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单一的中华静态的高层思想精神文化、（二）走向动态的中西文化、（三）静态的高层文化已淡化，反之中西之中基层文化以及符合国情文化的深化。

由于受限于经济和师资的关系，笔者相信在当时规模较小的华校，由于受到资金的影响，所以并不如一些规模比较大的华校般，能提供多样性的文化教育。

（二） 华校掌校人的态度

让早期的学童接受不同的文化教育，华校的创办人、策划人以及校长实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对于课程纲要选择的取舍，是影响华教如今发展的重要过程。而这些绝大多数的华校领导者的性格显然是，由美国 Berry, J.W.、Kim, U.等学者所提出的其中一项个人文化适应模式，

即民族平等²³。

这些华校领导者，他们在面对新文化的冲击时，并没有摒弃原有的中华文化教育而是选择了融合中西的教育文化。这一点，在面对英殖民政府颁布的各种教育法令及改制风波时，绝大部分华校领导者唯有并选择性地舍弃部分的课程，但是却坚持使用所重视的母语以教育子弟。

以钟灵学校为例，当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颁布以后，当时的校长王统存及全体教师方宗元、陈泽民、陈瑞安、曾劲刚、曾士省，自动辞职，以示抗议。（叶钟玲，2009：25）尔后，为了教育华人子弟，钟灵学校于1922年重整旗鼓，取消校长制，改设教务长，是年正式向当地政府注册。（25）同时为了顺应当地的社会需求，首位钟灵教务长顾因明于1923年提倡双语并重。（26）为符合钟灵“授以实用之智识技能”、“实业界之人才”的宗旨，所以开设了商业知识、簿记、打字等课程，使学生能吸收到实际的知识。（27）在编制课程时，初中一除英文课以外，其它科目皆以华文教授；初中二的历史、地理、数学、商业常识，都开始加入英文教本或补充教材；初中三，除华文科以外，其它科目绝大部分都采用英文课本以及补充教材。²⁴

²³ 美国 Berry, J.W.、Kim, U.等学者提出了四项个人文化适应模式，即：第一，同化——一个人抛弃自己的文化和身份，一味适应所在国文化；第二，游离——一个人对于原有文化的认同以致拒绝认同所在国及排斥其文化；第三，民族平等——一个人愿意认同所在国及其文化的同时还保留原有的文化；第四，边缘化——一个人排斥原有及所在国的文化。（Berry, J.W., Kim, U., Minde, T., & Mok, D., 1987: 495）

²⁴ 详见南洋槟榔屿钟灵中学校（1926）。〈附录：各级课程述概〉，载：《钟灵中学校刊》。槟榔屿：钟灵中学校，28-33。

为了适应国情、社会、时代，当时不仅仅只有钟灵中学在课程上做出调整，马来亚各处的华文学校也是如此，不同之处只是在课程、授课时间、教材上有差异而已。

对于新事物的发生，并非所有人都能无条件地立刻接受，就如女子教育的提倡、女权解放，抑或是英殖民政府颁布学校注册法令。所以当各华校领导者知道学校注册法令后，以自动辞职、举行示威行动，以表示对该法令的不满。但，当人们理解事实状态以后，会去接受并寻找出路。因此钟灵教务长顾氏在理解钟灵前人所立下的宗旨，即理解马来亚对于当时的华人人民而言，是为了赚钱养家并且融入在地的生活。所以制定适合的课程才能在传授实用的知识的同时，让学生学习母语。

第五章

华教与华人移民和华人人口、经济及政治之关系

在科学与工艺发展的影响下，加上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变迁，简单的传统教育模式已不再能够满足社会的新需求了。近百年来，改革的呼声与日俱增，但一般教育者的视线都只放在满足政治与社会的两方面需求，所达到的成就也以此最为可观。到了今天，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建立其国家教育系统，以及实施达到某种程度的义务教育。（魏维贤，1971：100）但，经济学家却充分认识一个国家一般经济的发展是有赖于社会与政治发展的配合与支援才能收到最高的效率。（102）

教育至今都是倾向于功利现实主义，早期的华文教育也不例外。功力与现实基本上是华社中最普遍的价值取向，“出路问题”是华人主要的考虑标准（孙和声，2007：17）海外华人买官封衔的时间颇早，在清政府于新加坡设领之前就已存在。道光 26 年（1846），檳榔嶼侨领陈奇馆拥有布政使司理问的官衔，是最早获得官衔的海外华人，而新加坡最早获得的则是章方林，就连驻新第一任领事胡璇泽也捐有道台衔。但是这些封官的新马华人毕竟是少数，大规模的鬻官卖爵时期要在中法战争期间及其以后才出现。（蔡佩蓉，2002：81）就如崔贵强也说早期的华校“独缺少英语之教授，这对生长在英殖民地的华人弟子来说，不论是谋事与处世，是很不利的。”（崔贵强，1994：155），教育就是作为

达成某种利益而生的。

有部分经济学者认为教育制度的改变及实践，将影响社会因素如不均等的收入。（Wells, R., 2006: 7）不均等的收入与大众受教育的平均值与散播有着相关联系，收入不均等的提高与受不同的教育程度有关。

（José, D. G. & Lee, J. W., 2002: 397）

为此，笔者在本章主要讨论的是华教与华人移民和华人人口、经济以及政治之间的关系。

第一节 华人移民与华人人口

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移民这一现象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从流量、流向和移民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林珊珊，2003：76）一个国家的经济因素，是其中一个影响移民迁入的重要因素。亚洲在 20 世纪中叶登上大规模的全球性人口移民的舞台，是始自在工业化的后殖民时期对于经济和政治的开放。（Castles, S. & Miller, M. J., 2009: 127）英殖民政府在掠夺马来亚、新加坡的丰富自然资源，把其当成英国的原料产地、商品倾销市场和资本输出场所的过程中，碰到一个极其突出的问题，这就是：人口稀少，劳动力奇缺（林远辉、张应龙，2008：96、97）英殖民政府为解决人口稀少和缺乏劳动力的困难，便大量从印度，特别是中国输入被英殖民政府认为最理想和廉价的劳工。（98）

根据李长傅在其著作《南洋华侨概况》分析了华人移民人口数目与经济之间的关系。1913 年始是树胶的黄金时代，劳力需求甚大。到了 1918 年和 1919 年，由于金价过低，加上原本叻币 1 元折合华币为 89 角至 1 元以上，这两年叻币 1 元只能折合华币 3 角，故很多华人都不愿南渡马来亚。1920 年开始，华人移民人数逐年攀升，虽当时面临经济恐慌，百业凋零，谋生不易，但华人移民反逆流而上，这与当时金价的攀升不无关系。到了 1925 年，华人移民人数激增，不全然是由于金价胶锡市场之佳，而中国时局之扰乱，亦是重要原因。（李长傅，1930：79）

表 5.1：马来亚华人移民人口成长百分比（1913-1926）

年份	移民数	百分比
1913	240975	89.2
1917	155167	57.5
1918	58421	21.6
1919	76912	26.2
1920	126077	46.6
1921	191043	70.7
1922	132886	49.2
1923	159016	58.9
1924	181430	67.2

续表5.1

年份	移民数	百分比
1925	214692	69.5
1926	348593	119.1

资料来源：李长傅，1930：78-79

依照上列说言，当一个地域缺乏人口，其资源很难能被采获并加以利用在经济领域之上，促进一个地域的经济发展。当原料物价上涨时，反之会刺激移民的涌入而照成人口的提升。

第二节 华人经济与华教发展

马来亚华校的设立与发展，都是由华社各界人士，一同在经济上打拼而得以筹资兴建的。华人大量南移进入马来亚，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叶这段时间。在马来亚这块新土地上，华人胼手胝足，努力打拼，首先将经济发展起来。他们同时又善于将在当地所取得的财富，适当的用来兴建华文学校，努力将华文教育办好，以栽培后辈，除了承传中华文化之外，也为社会培育有用之人才。（林水椽，2010：516）

马来亚华教向来仰赖着华人社会给予经济上的支持，而当马来亚经济受影响之时，华教的发展也受到影响。1929至1936年，马来亚因受世界不景气影响，华人的经济大受打击，破产者比比皆是，马来亚各华

校过去多赖华人捐款，至无法维持者日有所闻，尤其是附设于胶园内的华校，无一不停办。迨“七七”抗战发生，华人经济已趋好转，华校除停办者相续恢复外，并积极增加。（华侨志编纂委员会，1959：175）

早期的女子受教育在当时也是受到华人社会个体经济的影响，潘会杨对战前的潘家村回忆道：

本身没有受教育，他们都希望子女能够受一点教育啦。不过因为家庭环境不好，每个是先把男的送去读书，女的做候补，有机会的话，经济能力允许（父母）才会把女儿送去读书。我记得当时我们读书的时候只有四个是女生……（林孝胜编，1991：55）

华人在经济能力所能及之下，首先都会选择送男童去受教育，若经济再许可的话，女童才有受教育的机会。

除了华人的经济能力影响华校发展和华人子弟受教育以外，另一个则是华人期冀子弟将来能在经济上有一定的成就而将子弟送去受教育。早期的私塾是延续中国的教育制度，而在中国读书人是以做官为终极目的，可是在马来亚，读书人是以谋生发展为出路。（陈育崧，1984b：227）在马来亚华文教育兴学初期之时，正值英殖民主义逐渐膨胀，当时的华人为了子女在将来能在社会上谋得一份工作，华人子弟多送往英校肄业（245）。

以女子教育为例，战前新马华族妇女的职业是随着经济发展和女子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逐渐拓展的。（范若兰，2005b：166）在20世纪以

前，马来亚华人妇女局限在女仆、裁缝、小贩和妓女等少数几种职业。随着马来亚锡矿业、橡胶业和制造业的发展，20 世纪后华人妇女职业范围扩大，首先表现在职业种类增多，有种植园工人、锡矿工人、建筑工人、制造业工人、女仆、女教师、女律师和女秘书等。还出现为数甚少的种植园主、矿山主和店主。其次表现在职业妇女人数的增多。（174）

所以可以说，马来亚的经济支持着华教的发展，华教也为经济领域提供所需的人才。

第三节 政治与华校发展

马来西亚华教发展，向来一直都受到来自政治方面的影响，即使是到了 21 世纪，这个情况并没有任何改变。早期来自英殖民地以及中国的政府，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分别使用本身的权利和号召力影响着马来亚华文教育的发展。

（一） 英殖民政府

于 19 世纪至 20 世纪，在英国统治下的领土都充满了吸引力；中国在 19 世纪中叶，正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导致百姓难以生活（Lee, T. H., 2011: 1）因此，中国华人为了挣钱及远离战火，而选择南下至当时的英殖民地之一，马来亚，华教在当地也逐渐发展起来。

早期的华教充满中国色彩及情调，当时华教并不为殖民地政府所认同及接受（郑良树，1999c：192），并采取放任的态度面对华教。在未受英殖民政府影响之下的华教，发展迅速，许多间华校因此而设。

保皇革命党时期，袁世凯政权和英国关系良好，所以，英国殖民地政府不允许革命党同志从事筹款讨袁的活动，以免破坏中英关系。而革命党却不顾一切忌讳，通过教师的号召及影响，将华校卷入这场运动中。这时期的华校，完全是中国的学校，而且是深受政党政治影响的学校。（郑良树，1999a：29）再加上1919年，华社和华校由于积极参与反巴黎和约及反日抗英的活动中，因此没有响应殖民地政府通令各民族为英国在欧战中胜利的举行庆祝活动，（30）续而激怒了殖民地政府。于是在1920年5月31日，以〈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的方式，由海峡殖民地立法议会首读通过。强调法令必须通过的三大理由是：第一、学校只得作为教学的用途；第二、校内教师须受充分的师资训练；第三、教学不能违反殖民地政府的利益。（34）〈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的颁布不仅令许多华校关闭，同时还改变了华校的制度、师资、课程等。

英殖民政府对待华教的方式，虽曾令很多所华校关闭而影响了华校的发展，但若以正面的态度来看，这一举措是将当时混乱的制度、课程、卫生等，加以整合统一并使其更有秩序的一个重要阶段。

（二） 中国政治家

中国政治家主要从两方面影响了马来亚华校的发展，其一是中国执政政府对海外华校的态度，其二是保皇党以及革命党在马来亚的活跃。

早期的中国政府因为无法在金钱上奖励海外的办学者，而采取从精神上褒奖在马来亚办学的华人社会，这一举动影响了马来亚华校的发展。董大本在《百年尊孔人与事》里就载道：

其中办理完善，规模较大的华文学校，如马六甲的培风学校，吉隆坡的尊孔学校等，一经名人宣扬，政府奖誉，无不蜚声国外。于是兴办华文学校的风气日盛一日。（董大本：2007， 67）

19 世纪至20世纪 40 年代期间，在西方殖民政府统治下的华人，渴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在马来亚当地派驻领事，或通过外交的途径保护他们的经济利益与人身的安全，刺激了他们对中国政治的兴趣。（钟锡金，1984： 10）另一方面，对于当时在中国受到政治运动影响者来说，中华文化是他们想用来传播三民主义或华侨意识的工具。（林开忠，1992： 102）这些怀抱国家存亡之忧，同时受到西方进化论和民权学说影响的知识分子把结合中西改良主义思想推向高峰，并展开了以“救亡图存”和“强国保种”的爱中国意识。（李元瑾，1995： 275）

由于双方对彼此的需求，中国政治者为争取东南亚华人的支援，除了在东南亚各国派驻领事外，更经常派遣政府代表到东南亚来抚慰与视察，协助当地华人成立国民党支部，指导发展华文教育。（钟锡金，1984：10）将已经血缘化、民族化的华校染上浓厚的政治色彩，并且国民党化。所谓华校，完全是中国的学校，而且是深受政党政治影响的学校（郑良树，1999a：29）

以麻坡中华学校为例，同盟会于1912年联合麻坡华社各帮派领导人，创建该校（中化中学的前身）。可以说，当年孙中山到麻坡、马六甲和瓜拉庇劳活动，宣扬他的思想，间接地推动这地区华教的发展。

（郑昭贤，2012：17）马来亚华社需要发展华教，而中国政治家需要宣传华文教育和爱中国意识的培养，在民国初年是不可分割的事情。换句话说，开办侨校是手段，培养爱国的侨胞是目的。（黄贤强，2004：48）

在变法中，妇女解放问题成为改造社会的核心问题。（李元瑾，1995：275）如康有为所著《大同书》，是从教育、婚姻、人身自由、职业等各方面解放妇女，提倡男女皆平等独立（康有为，1994：294）。

《大同书》内很多内容，都提倡着解放妇女、妇女受教育的重要性，如：“……举数万万女子而幽囚之：一则令其不能广学识，二则令其无从拓心胸，三则令其不能健身体，四则令其不能资世用。”（189）、“……夫少成为性，长学则难，而人生童幼，全在母教；母既愚蠢不

学，是使全国之民失童幼数年之教也。”（189）等。而这些解放妇女的活动，也成为了提倡女子受教育、女学发展的因素之一。

总而言之，中国政府刺激了马来亚华教的发展，主要是来自两方面，其一是对马来亚华社人士的褒奖方式；其二是保皇及革命党为各自的政治目的而协助华教的发展。

第六章

结论

由于航海科技逐渐进步和发达，人们能更方便地在两个不同的国家间移动。中国早期在海外受教育的知识分子，将海外的教育体制、课程等带回中国，并将之与中国的教育体制、课程等相融合。中国的教育体制、课程等改变以后，其他的华人移民或部分知识分子就将该教育体制、课程等搬入移民国。

马来亚早期的华人人数非常少，随着政治、科技、世界局势的改变，马来亚的华人人数也越来越多。当华人人数多了，对于受教育的需求人数也随之提升，马来亚的华文教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设立的。

马来亚华文教育的发展始于私塾教育，此时的华教不论是课程或者课本都是完全源自于中国的。这时期的华文教育是不区分年龄，只要想念书，都可以报名入读，所以在同一间私塾内的学生年龄都参差不齐。后来由于中国受到来自多方面西方文化的冲击，因此开始推崇各种新思维运动。经过各种新思维运动的冲击和洗礼以后，中国的书院逐渐发展为学堂尔后成为了学校，这一个发展脉络也影响了马来亚华校。

在新式学堂开始发展以后，华校的制度及课程也开始改变，不再仅限于中华人伦价值的教育，而是更加的多样化。此时的华教由于不被

英殖民政府所重视，因此在不被受限的情形下，发展迅速。1920 年教育法令颁布以后，虽然在当下立刻导致多所华校接连关闭，但很快地，华社在适应了改变后，又再开始蓬勃发展。即使英殖民政府之后还颁布了津贴制度、教师法令等，这些旨在控制华校的法令，却不能阻止华校继续发展。

虽然中国自古已有不少幼童读物，但当时并没有一个有系统的机构或体制，将孩童们按照身体或思想的成长而配以适合的教育课程。当时的幼教，是由家人或是在私塾里习得。西方的幼儿园和幼教发展以后，这些体系、机构和课程也经由中国或者西方宗教师带入了马来亚的华文教育历史里。在马来亚时期，幼教还未受到华人社会的关注，致使幼教在马来西亚成立以后才逐渐开始备受关注。

马来亚华人女子教育也是受到当时社会上解放妇女的运动以及在华社领导人提倡女子教育的情况下开始发展。早期女校的发展并不如普通华校一般顺利，在缺乏经费来源以及师资的困境之下，女子学校的规模都比较小，而且校龄很短浅，很多女校都在这一时期面临各种问题而纷纷关闭。笔者认为，女子教育向社会大众筹款的结果不比普通华校来的有效，主要的因素除了与经济问题有关以外，另一个主要因素是来自当时的华社普遍还没有兴起女子受教育的概念。当一个社会认为女子无需受教育，往后只要嫁户好人家并相夫教子便已足矣之时，女孩童无法受教育；当一个社会认为女子有受教育的必要，以便往后能在经济上、

人身上取得独立和自由，并藉由所学的知识好好教育下一代之时，女童则有受教育的机会和可能性。

马来亚的华文学校文化的发展是由单一的，只有高层中华文化的教育开始。历经西方多种新文化和思维的冲击之下，逐步发展为兼具中西文化的教育。也由绝大多数的人伦价值教育，发展为包含多种中华文化及西方文化，适合马来亚社会环境的多元教育。中华文化的淡化虽然可惜，但是有了这些领导者、掌校人、华人社会对文化、华文教育的坚持及灵活性，才令华教得以延续至今。

政治、经济、人口以及教育之间的关系是环环相扣的，它们之间互相影响着彼此的发展。华文教育的出现，是由于当时华社人数的增加，在有了一定的需求量以后，华文教育就开始出现了。随着人口以及经济的成长，华校得以设立及发展。但华校的发展及变化，也受到了当权者的政治影响。就如之前所述，英殖民政府颁布的〈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中国政府奖励办好华校的华人、保皇以及革命党为宣扬其政治理想而建设及提倡对其有利益的教育等等。这些政治活动，同时也影响了华校教授学童的课程以及各种文化。

英殖民政府在当时颁布的种种法令虽说曾经阻碍了当时华教的发展，但是也多亏了这些法令，才使马来亚华校的各种制度、课程、教学，得以统一并且制度化。这道理与部分人痛批英国统治马来亚是不正

确的行为，可是也多亏英国希望在马来亚取得各种天然资源，引进大批的华人，马来亚的经济才得以快速提升，交通网络等设施的成立也促进了马来亚各城市的发展。

简而言之，由于英殖民政府为了在经济领域上获利而在马来亚引入华人、中国政治家的干预、逐步发展的航海科技、全球化移民的发展、各思想和解放妇女的运动、华人“必须受教育”的坚持和理念等种种因素影响之下，马来西亚华教才得以不断地进步，为本土化教育并取得如今的成就。

当然，笔者认为影响华教发展的因素并不单单只是这几方面而已，这当然还包括当时华人社会的心态、东西各国往来等等的影响。本论文虽无法完善这些方面，盼往后的研究者能以更深入和阔的范围研究影响华教的所有因素。

征引资料

甲、 中文部分

(1) 报纸（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馆藏）

（1907年6月22日）。〈州府近闻〉。《槟城新报》，3。

（1920年9月24日）。〈各国婚礼奇闻〉。《叻报》，9。

（1920年9月29日）。〈看看孔圣诞日养正学校之音乐大会〉。《叻报》，2。

（1920年9月29日）。〈应新学校建校筹办处启事〉。《叻报》，2。

（1920年9月30日）。〈南洋工商不惜学校之乐观〉。《叻报》，2。

（1920年10月1日）。〈关于教育新例文件〉。《叻报》，6-7。

（1920年10月6日）。〈南洋女学校演剧筹款启事〉。《叻报》，2。

（1922年1月3日）。〈树胶销场最近状况〉。《叻报》，2。

（1922年11月8日）。〈忠告青年男女〉。《叻报》，15。

（1922年11月8日）。〈秘结之预防〉。《叻报》，15。

（1922年11月9日）。〈家庭须知〉。《叻报》，13。

（1922年11月9日）。〈乘足踏车者宜注意〉。《叻报》，13。

（1921年2月3日）。〈新法教科书〉。《新国民日报》，1。

(2) 专书

- 巴素博士【著】，刘前度【译】（1950）。《马来亚华侨史》。檳城：光华日报有限公司。
- 蔡佩蓉（2002）。《清季驻新加坡领事之探讨（1877-1911）》。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
- 曹云华（2001）。《变异与保持：东南亚华人的文化适应》。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 陈国华（1992）。《先驱者的脚印——海外华人教育三百年1690-1990》。Toronto: Royal Kingsway Inc.。
- 陈嘉庚（1946）。《南侨回忆录》。新加坡：南洋印刷社。
- 陈育崧【著】，椰阴馆文存编委会【编】（1984a）。《椰阴馆文存》第一卷。新加坡：南洋学会。
- _____【著】，椰阴馆文存编委会【编】（1984b）。《椰阴馆文存》第二卷。新加坡：南洋学会。
- 崔贵强（1994）。《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联合出版。
- 鄧红波（2005）。《中国书院史》（东亚文明研究众书 30）。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 董大本（2007）。〈南洋华侨反对英帝摧残华侨教育的斗争〉，载李芳钧编，《百年尊孔人与事》。（页 67-78）吉隆坡：尊孔独立中学。
- 范若兰（2005a）。《移民、性别与华人社会：马来亚华人妇女研究（1929-1941）》。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 华侨志编纂委员会（1959）。《马来亚华侨志》。台北：华侨志编纂委员会。
- 黄尧（2003）。《马星华人志》。吉隆坡元生基金会、吉隆坡马来西亚黄氏联合总会（江夏资讯活动基金会）联合出版。
- 黄玉莹、李亚遨主编（2010）。《坤成百年校史汇编：1908-2008》（上册）。吉隆坡：坤成学校董事会。
- 康有为【著】，邝柏林【选注】（1994）。《大同书》。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 李恩涵（2003）。《东南亚华人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李长傅（1930）。《南洋华侨概况》。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
- 李盈慧（1997）。《华侨政策与海外民族主义（1912-1949）》。台北：国史馆。
- 林水椽、何启良（1998）。〈导言〉，载何国忠、何启良、赖观福、林水椽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一册）。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xix-xxxvii。
- 林孝胜编（1991）。《潘家村史》。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
- 林玉体（2006）。《西方教育思想史》。北京：九州出版社。
- 林远辉、张应龙（2008）。《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 毛礼锐、邵鹤亭、瞿菊农（1989）。《中国教育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 莫顺生（2000）。《马来西亚教育史1400-1999》。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

- 孙和声（2007）。《华人文化述评：兼论东西文化、宗教与人生》。吉隆坡：燧人氏事业有限公司。
- 宋哲美（1964）。《马来西亚华人史》。香港：中华文化事业公司。
- 王国璋（1997）。《马来西亚的族群政党政治（1955-1995）》。台北：唐山出版社。
- 王增炳、余纲（1981）。《陈嘉庚兴学记》。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 魏维贤（1971）。《教育论丛》。新加坡：友联书局有限公司。
- 翁世华（1961）。《星马教育众谈》。新加坡：星洲维明公司。
- 许甦吾（1949）。《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新加坡：新加坡南洋书局。
- 严正（2004）。〈序〉，载黄露夏编，《马来西亚华侨华人编年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杨林（2009）。《东盟教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养正学校金禧纪念刊》出版委员会（1956）。《养正学校金禧纪念刊》。新加坡：养正学校。
- 叶钟玲（2009）。《槟城钟灵中学史稿（1917-1957）》。新加坡：华裔馆 Chinese Heritage Centre。
- 张礼千、姚楠【著】，中国南洋学会【编】（1946）。《槟榔屿志略》。上海：商务印书馆。
- 张少宽（2002）。《槟榔屿华人史话》。吉隆坡：燧人氏事业有限公司。

张岩冰著、王岳川编（2001）。《女权主义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郑良树（1998）。《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一分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

_____（1999a）。《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第二分册）。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

_____（1976）。〈华人文化和国家文化〉，载郑良树、陈祖排编，《灵根自植》。（页 133-138）。吉隆坡：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

_____、魏维贤（1975）。《华文中学特刊提要附校史》。吉隆坡：马来西亚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

郑昭贤编（2012）。《中化历史长河》。麻坡：麻坡中化中学。

庄泽宣（1953）。《从巴黎到槟城》。新加坡：南洋商报社。

钟锡金（1984）。《星马华人民族意识探讨》。亚罗士打：赤土书局。

（3） 论文 / 期刊：

安焕然（1998）。〈独立前华人经济〉，载林水椽、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二册。（页289-324）。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

安焕然（2009）。〈华教精神与华文教育〉，载文平强、许德发主编：《勤俭兴邦：马来西亚华人的贡献》。（页31-54）。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曹淑瑶（2005）。〈战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的困境〉，载何国忠编：《百年回眸：马华文化与教育》。（页287-306）。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 陈爱梅（2009）。〈巾帼建国：大马华人女性经济、教育及政治与初探〉，载文平强、许德发编：《勤俭兴邦：马来西亚华人的贡献》。（页377-399）。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 崔贵强（1972）。〈星马华族社会运动的主流问题〉，载柯木林、吴振强编：《新加坡华族史论集》。（页119-132）。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
- 方起驹、金永礼、杨耀宗（1984）。〈新马华人教育发展小史〉，载吴泽主编：《华侨史研究论集（一）》。（页330-337）。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何国忠（1995）。〈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与文化遗产过程中的边缘心态〉，载林孝胜编：《东南亚华人与中国经济与社会》。（页 163-183）。新加坡：新加坡亚州研究学会、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联合出版。
- 何国忠（2003）。〈多元文化下的抉择：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文化人〉，载何国忠主编：《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文化篇——承袭与抉择》。（页 xxvii-1）。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 范若兰（2005b）。〈二战前新马华人女佣的工作与社会活动〉，载黄大志、王业芎编：《新加坡、马来西亚华族民生文化的演变》。（页 166-182）新加坡：新加坡炎黄文化研究会。
- 洪丝丝（1984）。〈华侨对辛亥革命的巨大贡献〉，载吴泽编：《华侨史研究论集（一）》。（页208-225）。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黄松赞（2005a）。〈论华人文化对海外华人经济发展的作用〉，载《新加坡社会与华侨华人的研究》。（页355-370）。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 _____（2005b）。〈论华侨文化的内涵、特点及其演变〉，载《新加坡社会与华侨华人的研究》。（页371-388）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黄贤强（2004）。〈槟城华人妇女问题——以《槟城新报》之女子教育论述为中心〉。《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第7期：43-65。

赖观福（1982）。〈马华文化导言〉，载赖观福主编：《马华文化探讨》。（页1-4）八打灵：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会总会。

李安山（1998）。〈论“非殖民化”：一个概念的缘起与演变〉，载《世界历史》，第4期：2-13。

李业霖（1972）。〈中国帆船与早期的新加坡〉，载柯木林、吴振强编：《新加坡华族史论集》。（页1-9）。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

李元瑾（1995）。〈新加坡海峡华人知识分子的女权与女学思想〉，载杨松年、王慷鼎编：《东南亚华人文学与文化》。（页262-308）。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

廖文辉（2007）。〈略论大马华族文化的困境〉，载《华教历史与人物论集》。（页15-25）八打灵：策略资讯研究中心。

林开忠（1992）。《从国家理论的立场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运动中“传统中华文化”之创造》。（未出版硕士论文）。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所。

林珊珊（2003）。〈国际移民的走势比较与动因分析〉。载《亚太经济》，第5期：76-78。

林水椽（2005）。〈百年华教：从传统到现代〉，载何国忠编：《百年回眸：马华文化与教育》。（页347-362）。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_____（1998a）。〈独立前华文教育〉，载林水椽、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二册。（页215-254）。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

_____（1998b）。〈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论述〉，载《马中文教与思想抉择》。（页1-20）。怡保：艺青出版有限公司。

_____ (1998c)。〈马来西亚小学及中学华文教育发展〉，载《马中文教与思想抉论》。(页60-81)。怡保：艺青出版有限公司。

_____ (1999)。〈马来西亚成立前华文教育的发展与教育政策的冲突〉，载林水椽、博孙中编：《东南亚文化冲突与整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107-126)。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与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联合出版。

_____ (2010)。〈为国建功：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与贡献〉，载文平强编：《马来西亚华人与国族建构——从独立前到独立后五十年》下册。(页515-534)。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林远辉 (1981)。〈马来亚独立前的华侨学校〉，载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编：《华侨史论文集》，第二集。(页241-265)。广州：广州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

刘为胜 (2009)。《二战前英属马来亚马华隔离研究》。(未出版硕士论文)。厦门：厦门大学世界史。

潘友来 (1985)。〈华文报章与华裔社会〉，载林水椽编：《文教事业论集》。(页174-187)。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

沈慕羽 (1995)。〈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奋斗史篇〉，载朱浚源主编：《东南亚华人教育论文集》。(页1-12)。屏东：屏东师范大学。

苏秀康 (1996)。〈幼稚教育的演进〉，载菲律宾华文教育研究中心编：《幼教三巨人及其他——苏秀康专辑》，《华文教育》文集3。(页1-23)。毕隆多：菲律宾华文教育研究中心。

汤利波 (1982)。〈我国华文小学的沿革〉，载赖观福主编：《马华文化探讨》。(页57-70)。八打灵：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会总会。

王成 (2003)。〈从对抗到合作——马来亚非殖民化研究〉。载南京大学：《学海》，第2期：86-91。

王品棠（1985）。〈马来西亚华人教育与华人文化〉，载林水椽编：《文教事业论集》。（页15-22）。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

____、徐柳常（1985）。〈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回顾与前瞻〉，载林水椽编：《文教事业论集》。（页23-39）。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

萧遥天（1982）。〈中华文化的本质特征及对马来西亚的贡献〉，载赖观福主编：《马华文化探讨》。（页5-16）。八打灵：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会总会。

许云樵（1978）。〈中华民族拓殖马来半岛考〉，载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马来西亚华人文化研究论文集》，第一辑。（页57-134）吉隆坡：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

颜清湟（1998）。〈华人历史变革（1403-1941）〉，载林水椽、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一册。（页3-76）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

严元章（2002）。〈母语与教育〉，载严元章文集编委会：《严元章文集》。（页78-91）。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总会、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槟城韩江中学校友会、峇株及中马华仁中学校友会、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联合出版。

曾丽萍（2000）。《西马来西亚华文报业发展的政经分析（1880-2008）》。（未出版硕士论文）台北：世新大学新闻研究所硕士在职专班。

张文娟（2007）。〈在启蒙与鼓吹之间——20世纪初中国现代妇女解放进程与早期新文化运动的关系〉，载荒林编：《中国女性主义》。（页45-58）。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亚群（1996）。〈当代东南亚华文教育面临的文化遗产问题辨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第1期：7-13。

郑良树（2005）。〈从华教史，论大马中华文化的起承转合〉，载何国忠编：《百年回眸：马华文化与教育》。（页363-373）。吉隆坡：

华社研究中心。

_____ (1999b)。〈华文教育——超越认同的困扰〉，载《马来西亚华社文史论集》。(页83-93)。士古来：南方学院。

_____ (1999c)。〈华文教育——从误解到理解〉(附录)，载《马来西亚华社文史论集》。(页191-194)。士古来：南方学院。

钟临杰(1998)。〈西马华族人口变迁〉，载林水椽、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第一册。(页197-233)。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

钟佩琼集译(1957)。〈吉隆坡坤成女中奋斗史——侨校一页光辉的记录〉，载华侨教育编辑委员会主编：《华侨教育》，第一卷合订。(页32-34)。台北：华侨教育社。

(3) 中文杂志

许福吉、陆锦坤(2010)。〈文化的硬道理〉。《怡和世纪》怡和轩会刊，第十二期•增新号，2。

(4) 中文校刊

南洋槟榔屿钟灵中学校(1926)。〈附录：各级课程述概〉，载：《钟灵中学校刊》。槟榔屿：钟灵中学校，28-33。

乙、英文部分

(1) Printed Material:

Castles, S. & Miller, M. J(2009).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Fourth Edi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Edgar, A. and Sedgwick, P. (2006). *Cultural Theory: The Key Concepts*. New York: Routledge.

Emerson, R. (1970). *Malaysia: A Study in Direct and Indirect Rule*.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Dabbs, D. M. (1994). *The History of Gan Eng Seng School*. Singapore: D. M. Dabbs.

Lee, T. H. (2011). *Chinese Schools in Peninsular Malaysia: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aughan, J. D. (1879).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 Singapore: Mission Press.

William Wenn , Wu T. Y. (1951). *Chinese Schools and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Malaysians*. The Report of A Mission Invited by the Federation Government to Study the Problem of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in Malaya. Kuala Lumpur: Government press.

(2) Thesis / Journal:

Berry, J.W., Kim, U., Minde, T. & Mok, D. (1987). Comparative studies of acculturative stres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XXI, No. 3, 491-511.

- José, D. G. & Lee, J. W. (2002). Educ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New Evidence from Cross-Country Data.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Series 48, No. 3, 395-416.
- Bahadin, K. (1996). *History of an English School-Gan Eng Seng School 1885-1996*, (Unpublish B.A thesi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 Lim, C. K. (2008). At the Nation's Service: Development and Contributions of Chinese Education. (Reprinted from) Voon, P. K. (Eds.), *Malaysian Chinese and Nation-Building: Before Merdeka and Fifty Years After*, Vol 2.(pp. 610-635) Kuala Lumpur: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3) Website:

- Wells, R. (2006). *Education's Effect on Income Inequality: A further Look*. Retrieved from <http://www.computing.ccpr.ucla.edu/publications/conference-proceedings/CP-05-054.pdf>
- The Malay Reservation Enactment, 1930. Enactment No. 18 of 1930. Retrieved from <http://ptjkb.kelantan.gov.my/v2/images/tanah/Enakmen%20Rizab%20Melayu%201930.pdf>
- Land Enactment, 1938. Enactment No. 26 of 1938. Retrieved from <http://ptjkb.kelantan.gov.my/v2/images/tanah/Enakmen%20Tanah%20Kelantan%201938.pdf>

丙、马来文部分

(1) Buku dan Artikel

- Yaakob, HJ Z., Sulaiman, M. & Jani, HJ N. (2011). *PRA 3101: Asas Pendidikan Awal Kanak-Kanak*. Cyberjaya: Institut Pendidikan Guru Malaysia.

Harun, Abd. G. (1982). Undang-undang Tanah Simpan Melayu: Tinjauan ke atas Dasar British dan Implikasinya kepada Masyarakat Melayu Negeri Sembilan hingga Perang Dunia Kedua. *Jebat: Malaysian Journal of History, Politics and Strategic Studies*, 11, 78-94

附录

表 7.1: 日本横滨大同学校《小学新读本》卷一至卷三目录

课	卷一	卷二	卷三
第一课	日及鸟	割禾	孩子打蚱
第二课	紫藤及牡丹	垂钓	鸡公珍珠
第三课	云雀及黄莺	秋季	电车
第四课	舞猴	诗	砂纸
第五课	车轮	水车	冒雪返馆
第六课	菊花	鸡及猫	狮驴争气
第七课	圣像	金鱼	读书之法
第八课	兄弟正直	毛菇	歌
第九课	雪人	冬季	鹅生金蛋
第十课	抛球及打秋千	诗	农夫救蛇
第十一课	放纸鸢	指南针	野兔
第十二课	气泡	读书敲棋	白鹅
第十三课	童子职业	读书写画	犬影
第十四课	敬长	货车	鸠之传书
第十五课	问新年	孔子圣诞	书之
第十六课	月形	续前	狐指骂菩提
第十七课	鸡蛋	猴	野猪自护
第十八课	狗寻主人	牛及马之用	货币

续表 7.1

课	卷一	卷二	卷三
第十九课	子孝父母	风琴	鹰夺巢食
第二十课	卫兵	电灯	蜗牛
第二十一课	春季	检身	蜘蛛设计保命
第二十二课	诗	礼貌	毒蛇咬铗
第二十三课	逆水船	火柴	猴与鹦战
第二十四课	耕田	德律风	歌
第二十五课	教盲人	人力车	麻
第二十六课	分左右手	马车	鸟鹊食蚶
第二十七课	象	敬师	蜜之妙计
第二十八课	牛	续前	怜老人
第二十九课	夏季	施济穷民	温泉
第三十课	诗	孝事祖母	五金
第三十一课	女工	燕与雀	续
第三十二课	假马	兔龟竞走	歌
第三十三课	体操	脚车	猜物
第三十四课	持枪及剑	留声机器	蟹及猿
第三十五课	兵戏	天生之物	续
第三十六课	忠孝	智慧	续
第三十七课	燕雏	童性温柔	鼠报师恩
第三十八课	月影	听父训	新闻纸

续表 7.1

课	卷一	卷二	卷三
第三十九课	钟	浅水轮船	歌
第四十课	棉裘	电线	鸦插假毛
第四十一课	老鼠	诚实	牛狗同群
第四十二课	落梅惊读	勤助父业	鸡鸽同饲
第四十三课	帆船	人及鸟兽	饮食
第四十四课	验算学	歌	书信之法
第四十五课	考试受赏	汽车	书之文
第四十六课	歌	深水轮船	学校
第四十七课	四方之向	勤俭	歌
第四十八课	书及鲤鱼	师弟	二草羊
第四十九课	井	识见	举起重人
第五十课	夺旗竞走	-	三角镜

资料来源：黄玉莹、李亚遨，2010：142